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1 期（总第 349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19 年 1 月 5 日

-
- ◆ 什么是“集体经济组织”郭书田(1)
 - ◆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丁玉华(8)
 - ◆ 小农生产与农业现代化.....杜 鹰(10)
 - ◆ 改革开放农业机械化大发展.....宋树有(13)
 - ◆ 农业对外开发与国际粮食援助.....朱丕荣(15)
 - ◆ 中煤神州永清籽粒苋基地参观感.....陈幼春(18)
 - ◆ 七论践行“三农”必须强、富、美.....李毓堂(21)
 - ◆ 生态文明与比较视野下的乡村振兴战略.....温铁军(26)
 - ◆ 在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周年与乡村振兴战略研讨会暨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年会上的讲话.....胡兆荣(35)
 - ◆ 关于重视推广《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科研成果的报告.....中管院农经所河南研究室(39)

什么是“集体经济组织”

——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年会的发言

郭书田

今天是“冬至”，召开2018年的年会与大家见面，互通信息，交流经验，各抒己见，讨论“三农”问题。这次年会的主题是纪念农村改革40周年与乡村振兴战略问题。胡兆荣同志汇报了一年来农经所取得的成绩，韩德乾老部长、宋洪远主任等专家学者等作了重要发言，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建议，一些企业界人士介绍了宝贵经验，都是很可贵的。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通讯》在胡所长主持下，在许多老领导、老专家大力支持，几位年轻同志，不辞辛苦，努力奋进，编印与发行运作工作都很有成效，受到作者与读者的欢迎。在此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与崇高的敬意。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一年来已成为国内外议论的热门话题。农村是改革的突破口，带动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这次改革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也可以说邓小平理论的胜利。回顾40年历史，既要充分肯定取得的重大成就，总结创造的丰富经验，又要实事求是地反思出现的失误与缺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遵守的行为准则。也可以说党领导革命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闻过则喜，过勿惮改，不讳疾忌医，勇于作自我批评，是转危为安、克敌制胜，应对各种风险的法宝，也是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文化的精华，需要永远传承发扬。在回顾40年农村改革的巨大变化中，以事实为依据，既可作纵向的比较，又要作横向的比较，看到差距与不足，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自满与盲目乐观。早在2011年4月27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时，我写过一篇《农村政策失误的反思》文章，列举十个需要反思的问题（附后）。今天就什么是集体经济组织，做一点反思研究，与大家共同探讨。

农村以土地为主的集体经济，是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标志，成为不能动摇的红线。有的领导同志强调，改革不能把土地的集体所有改没了，即变成私有化。最近农业农村部向以小岗村为首的10个村集体经济组织颁发了证书，被认为这是集体经济组织的“身份证”。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13万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占总数的1/3。需要讨论的是集体经济组织颁证的依据是什么？人们还不大清楚。

“集体经济组织”这个词来自于前苏联，在上个世纪30年代，斯大林领导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命名为“集体农庄”，成为公有制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形式。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吃大锅饭”缺乏生命力的“公有制”形式，是不成功的。这种“农业集体化”影响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包括我国在内亚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农业集体化”完全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有关农业合作化思想。早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产生了第一个名为罗虚代尔先锋合作社，创造了八项原则，包括入社自愿、一人一票、按交易量分配盈余等。1895年成立的国际合作社联盟确定为国际合作社运动的原则，推广到全世界，成为各国推行合作社的标准“模板”。它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并不意味着有什么社会性质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出路时，反复强调通过合作社的形式以示范与

社会帮助的方法，实现社会化大生产，把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才会有生命力。这种合作社采取自愿原则，不能采取强制手段，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不论有偿或是无偿，不论暴力或是非暴力。列宁在《论合作社》中，特别在“自愿”基础上增加了“互利”原则。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完全背离了这些原则，走了极大的弯路，产生了严重的失误。中国从1956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以行政手段无偿化为集体所有，犯了剥夺农民私有财产的错误，以至延续到人民公社，长达20年之久，成为“禁区”。改革开放以来，以小岗村18户农民为代表，冒着坐牢的危险，突破了“禁区”，创造了“土地包干到户”的经验，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解放了生产力。但是这项改革由于按户平均分配土地，自然会产生土地分散化、细碎化问题，形成“超小型”农户经济，同时只解决了生产经营自主权问题，尚未触及集体所有权虚化问题，并认可承担“交足国家”与“留够集体”的任务。在2005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果断地取消了包括连续2600年皇粮国税在内的各种税费负担，生产经营收入全归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成为“空壳子”。党的十六大以来，明确提出“探索集体所有产权有效实现形式”，农民创造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即把土地所有权以股权形式落实到农民身上，使农民获得了财产权，又一次解放了生产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推进股份合作改革，在各地试验，取得了显著效果。小岗村创造了土地包干到户的经验，但由分户经营规模很小，劳动生产率很低，加上产业结构以粮食为主，二三产业发展不足，虽经沈浩同志四年的艰辛努力，未能富裕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他们发扬小岗村精神，又一次大胆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实行“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农民变股东”的“三变”，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同时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二三产业，使农民大幅度增加收入。2017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1.8万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被认为是生产力的第二次大解放。小岗村的实践经验再一次证明，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就能创造奇迹。那么人们会问，“三农”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为什么得不到根本解决？这是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我认为，原因在于未能抓住“三农”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关键是产权问题，产权问题的要害是集体所有农民主体虚化问题。中央提出土地的三权分置，宅基地“三权”分置，关键是如何落实集体所有权，而不能虚置。实际上在“集体所有不变”的大帽子下，又把农民的财产权空置起来，这成为自1956年集体化以来剥夺农民土地财产权持续已久的“敏感”而谁都不敢碰的“禁区”，这是出现各种问题的总根子。实行土地的股份合作，把财产权还给农民，实际上其性质是纠正侵犯农民财产权、得罪农民、偿还欠债、多取少予，甚至只取不予的错误。为什么时到如今，在城市化中土地出让金从1999年到2017年累计高达34万亿元，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而农民所得无几。这是近年来又一次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最大剥夺，尽管有的领导人承认存在“重城轻乡”与“重工轻农”以及“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问题，而对这种违宪的侵权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最近正在修改《土地管理法》，我大声疾呼，要认真严肃正视这个问题，果断推进政府职能改革，放开一级市场，退出二级市场，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把出让金所得大部分留给农民，这是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唯一选择。

在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1000多个县（市区）试点，以及有13万个集体经济组织已完成产权制度改革中，可以认定，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有产权的合作经济组织，类似马克思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一是其成员是农民；二是农民拥有土地产权的有产者；三是土地财产权以股权形式为据，即由实物形态转为资本形态；四是在推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中，延长农业生产链，发展二三产业，解决多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还能以分红形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增加财产性收入；五是农民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既是劳动者，又是有产者，具有双重身份，通过社员（股东）大会或代表大会，在经济上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知情话

语权，决策参与权，资产处置权，收益分配权，民主监督权，管理人员选择权等，可以有效地防止产生“小官巨腐”问题。

这种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主体地位虚化的“集体经济组织”有本质的不同，不能混淆。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与党支部、村委会一起成为党在农村执政的三大基层组织，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共同奋斗。

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继续解放思想，扩大改革开放的九条任务，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并在实际工作中落实，取得更大成效。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长、高级经济师，2018年12月22日）

附件：

农村政策失误的反思

——纪念中国共产党90周年

郭书田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会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胜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以俄为师，学习苏联的经验，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了有计划地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采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由农民提供了巨额的原始积累，同时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完成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使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由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历时30年。在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农村为突破口，采取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胜利，也就是邓小平理论的胜利。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实行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治国理念的重大转折，使中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的发展阶段，并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措施，在改变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取得了显著进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阶段。

回顾历史，在看到我们取得辉煌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走过的曲折道路，出现过重大失误，付出过沉重代价。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实事求是地反思失误以及纠正失误的经验，以史为鉴，记取教训，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在完成土地改革结束了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分田到户以后，农民成为小生产个体劳动者，为避免产生新的两极分化，不失时机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这是由小生产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选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早在土地革命的苏区就有犁牛合作社、劳动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解放初期的互助组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相应的供销合作社与信用合作社形成“三足鼎立”的合作体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农业迅速恢复到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实行“私有公营”，纠正了有一些地方出现的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和强迫命令错误。但是在山西省委提出动摇、削弱、否定私有制以后曾受到华北局与刘少奇的批评，指出这是农业社会主义，也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支持山西省委的主张。在这种主张的影响下，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尚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急速地实行无偿将土地、农具、牲畜变为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于1956年宣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不久在“大跃进”中实现了政社合一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定了“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工作条例60条，由“私有公营”变为“公有公营”。供销社成为第二国营商业，信用社成为农业银行的附属物，长达20年之久。在1962年，修改人民公社60条时又把农民的宅基地也转为集体所有。

农民是劳动者，农民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多次强调对农民的私有财产是不能剥夺的，不论是“暴力”或“非暴力”，也不论是“有偿”或“无偿”。消灭私有制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不是消灭农民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我们把消灭私有制扩大到劳动者的私有制，犯了剥夺劳动者的错误，从理论到实践，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除了理论认识上的误解之外，重要的是受斯大林在苏联推行“全盘集体化”的影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理论上的差错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实践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也应成为思想理论“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合作社是以土地为核心将劳力、牲畜、农具等生产要素联合起来共同所有的经济体，它以服务为宗旨，而不以盈利为目的，是农民实现“民有、民管、民享”的经济实体，也可以称作集体经济组织，但同传统的“吃大锅饭”的管理制度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形成的“集体经济组织”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农民拥有资产所有权、决策参与权、收益分配权以及管理人员的选择权，而后者农民丧失了这些权利，成为通过工分获得收入的单纯劳动者，自然会伤害他们的积极性，因缺乏生命力而以失败告终，这已由历史的经验所证实。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在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为生存与发展，冒着风险，奋起突破禁区，实行土地的包干到户，即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承包的形式，取得经营自主权，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由“公有公营”变为“公有私营”，又一次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高速发展，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这种制度创新势如破竹、一泻千里、遍及全国的形势下，未能在人民公社解体的同时，重建真正的合作社，有些村成为“空壳村”，应该说也是一个失误。出现的所谓“谈合作变色”，是对扭曲“合作制”的非议，而需要的是真正的合作制。虽然提出了以分户经营为基础与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农村政策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的发展，但是这个统一经营的主体是含混的，并非合作性质。目前各地建立的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仍在产权制度改革中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在土地使用权流转中，保持承包经营权不变，并能分享土地的增值效益，获得财产性收入，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有产者，是农民的一个重大创造。在乡镇企业中个体、私营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股份合作制与土地的股份合作制形成社区股份合作制，对此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

科学的总结。农业部曾为支持股份合作制发过文件，召开了经验交流会，并列入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由于认识上的分歧甚大，有人认为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搁置起来，是一件遗憾的事。

三、在人民公社时期形成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把土地、劳力、牲畜、农具等固定到生产队，成为人民公社内部的基本核算单位。在毛泽东提出由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过渡、由集体所有——全民所有过渡、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过渡的思想影响下，不少地方出现了“穷过渡”。虽然在1970年的北方农业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强调要坚持人民公社60条确定的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反对“穷过渡”，但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有不少地方，由生产队过渡到生产大队。特别是在1976年中央49号文件提出要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大幅度过渡到大队的指标，造成严重后果，又一次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准则。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草案）》，当时在有些地方的合作经济组织缺位的情况下，将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管理权确定为村民委员会（设在原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村民小组设在原生产队），村委会成为家庭承包经营的发包方。1998年正式颁布这个法律以及《农业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都沿用这个表述，为“穷过渡”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个规定有两个缺陷，一是把经济管理权归为社会组织，是两个组织职能的错位；二是将核算单位由生产队“静悄悄”地过渡到大队。这种制度缺陷成为土地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

四、供销合作社在合作化初期，与农业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组成“三足鼎立”合作制体系。供销社的资产为农民共同所有。但在进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成为供销部。在人民公社时期成为第二国营商业，实际上由“民办”变为“官办”或“半官办”，是又一次对农民资产的剥夺。在加入国际合作联盟时，由于全国供销合作社主任不是选举产生而是一位商业部副部长兼任的，不符合联盟的规定，只好用“代主任”名义加入。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本应该恢复民办性质，但是遗憾的是走了向两极分化的道路。一极是乡村基层供销社解体为个体或私营单位，是集体资产的流失，走了私有化道路。另一极是县以上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成为国有商业的组成部分，走了国有化的道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规格上升，主任为副总理级，副主任为正部级，形式上是重视，实际上成为庞大的行政机构。虽保留了为农民服务的合作组织名义，但早已名不副实，异化为纯商业组织。应该说，在资产权上对农民又欠下一笔债。

五、信用合作社的命运，与供销合作社大致相同。在合作化初期，是三社之一。在高级社时期成为信用部，在人民公社时期，完全成为农业银行的附属物，由“民办”变为“官办”。在改革开放以后，基层信用社已经变形或解体，县以下的国家金融机构纷纷撤走，农村金融形成空白。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合作基金会，因管理不规范而被取缔。新建起的邮政银行实行只存不贷办法。信用社成为农村主要的金融组织，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加上作为用益物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每年的存贷差数千亿元，由农村流入城市，而农民贷款难成为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瓶颈，一些地方地下高利贷得以应运而生，受害的是农民。信用社仍打着为农民服务的旗号，而从存贷差获得巨额利润，这是背离合作制原则的必然结果。一些社会组织借用孟加拉国的经验推行向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只是杯水车薪。近几年，银监会推出设立乡镇银行、贷款公司、村基金互助社三项举措，并非合作制的金融性质。国际的经验充分证明，农村金融由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三种职能不同的机构组成，而合作金融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机构，在我国成为一个短腿。在国家农业投资公司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业发展银行为政策性金融，但又从事经营性存贷业务，一身二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会以政策性为名行经营性之实，其弊端是难以避免的。

六、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个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从土地革命开始就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领导的土地改革和改革开放以后支持农民创造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受到农民的欢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不但没有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而且由于实行城乡分割的两种户籍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农民成为“世袭农民”，形成失衡的二元社会结构。在近些年来，随着农村青壮年大批进入城市打工，农村出现了农业副业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村社管理空洞化问题，使大量土地城市化，而未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土地的大量流失，不仅使 18 亿亩耕地的红线难以保证，而且出现大量“三无”农民（无地、无就业出路、无社会保障），影响社会安定。有些地方在新农村建设中“大拆大迁”，目的是把农民的承包地与宅基地变为国有，从土地流转中以“低进高出”办法获取巨额差价收益，以土地生财，成为地方财政的第二来源，具有强大的驱动力。2010 年土地出让金高达 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6%，十分惊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政府职能的错位，即垄断一级市场和经营二级市场，一身而任。国务院采取急刹车的办法是必要的，但应标本兼治，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一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调整政府的垄断职能，放开一极市场，退出二级市场，加强宏观调控与监督。二是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地方财政的比重，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七、各种为农业服务的事业单位，包括农村教育、科研、推广等，都是公益性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将公益性事业单位变为经营性单位，成为创收的经营实体，严重削弱了公益性服务职能，这是“泛市场化”的结果。把事业单位划为三类：一是全额拨款；二是差额补贴，三是自收自支。如何界定他们的职能，尚待研究。在实践中往往把无偿服务变为有偿服务，以公益性为名行经营性之实。特别是把事业单位推向市场，走产业化之路，事业单位大办企业，成为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背离了服务的根本宗旨，变成单纯追求利润的经济实体，还给予政策的优惠，显然是不可取的。

八、在人事制度上历来是以德才兼备为标准。广泛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有德有才是精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危险品。目前在市场化大潮中出现的重才轻德问题以及以 GDP 论英雄的政绩观和考绩标准，不仅造成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以损害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严重后果，而且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高达 0.48，越过了警戒线，城乡居民收入为 3.23: 1，区域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很大，贫困人口按国际标准每日消费 1 美元以下计算尚有 1.5 亿，大部分分布在山区。农村基层干部的人权与事权分离，事权与财权分离，特别是一些经济实力薄弱的村，村干部的工资补贴由乡镇政府支付，无形中使村民自治组织变成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被人们称之为“准政府”，削弱了自治组织的职能。加上农村宗族势力的影响以及选举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农民难以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免收农业税和五项乡统筹费是十分必要的，受到农民的高度赞赏，但将村的三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干部补贴）也都去掉，特别是村办企业和经济实力十分薄弱的山区，村干部工作十分困难，需要有新的扶持政策。

九、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领域不起调节作用，只起影响作用。毛泽东认为由于存在国有与集体所有两种所有制经济，在集体经济中的生产资料不是由国家调拨的，价值规律仍起调节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忽视和背离价值规律的作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改革开放以后，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逐步由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应用价值规律实行宏观调控有了明显进

步。1979年——1984年粮食产量由3亿吨上升到4亿吨（1949——1958由1亿吨上升为2亿吨，用了九年时间；1959年——1978年由2亿吨上升为3亿吨，用了20年时间），在基础大的情况下增加一亿吨的时间缩短为六年，是多种因素取得的，而体现价值规律的价格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即在提高粮食收购价格30%的基础上实行超购加价50%的政策，使种粮农民大幅度增加了收入。特别是像小岗村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用钱靠欠债）无定购基数，交售的粮食全部是按超购加价计收的，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在1984年粮食达到4亿吨以上的形势下，于1985年采取了“倒三七”价格政策，使粮食产区和种粮农民大幅度减收，导致了粮食减产564亿斤，下降7%，是历史上少见的。究其原因不是当时的权威说法：一是天灾的不可避免，二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必要，三是有些地方领导的忽视，而是后来所说是由于对1984年粮食丰收估计过于乐观而采取了不当的政策措施。随后又把“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并采取化肥、柴油、预购定金“三挂钩”政策，虽有微小的恢复性增长而连续三年处于徘徊状态，以至出现了对家庭承包经营的非议，认为粮食减产与徘徊是方向道路问题。这个教训是及其深刻的，给我们上了一堂不能轻视价值规律的大课。

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以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人口，是了不起的成就。有力地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解放前夕发表的《对华白皮书》中称中国历届政府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的预言破产。中央始终强调把发展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并在安排投资上要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但是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并未真正兑现，处于“重工轻农”与“重城轻乡”的严重失衡状态。特别是农村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城乡关系严重失衡，历史的欠债太多。这种情况在山区和牧区尤为突出。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方针，并采取了包括取消农业税费在内的多项惠农措施，受到农民欢迎。但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状态并未根本改变。目前农村经济占全国GDP的贡献率在40%左右，而财政用于“三农”支出仅占财政总支出的10%左右。2010年财政用于“三农”支出为8579亿元，虽比上年增长18.3%，但占财政总支出的93180亿元的9.2%，而2008年仅乡镇企业缴纳的税金达8550亿元，接近2010年财政用于“三农”支出的总量。2011年的“三农”支出预算为9884亿元，同比增长15%，比上年的增幅下降了3.3个百分点，占财政总支出10020亿元的9.86%，比上年仅提高0.66个百分点。财政支出用于“三农”支出占GDP的比例，2010年为2.15%，2011年预算为2.29%，仅提高0.1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业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城乡二元结构深层次矛盾仍然突出的局面难以根本改变，“三农”工作是全党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要求难以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难以兑现。

90年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农民是牺牲最大的群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年代，农民是贡献最大的群体，而今仍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一方面表现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收入水平等与城市差别甚大；另一方面表现在进城的1.5亿农民工虽已成为城市建设特别是建筑与服务的主力军，而身份仍为农民，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国民待遇。回顾历史，面向现实，展望未来，我们要以史为鉴，正本清源，总结经验，调整政策，为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而继续努力奋斗。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长、高级经济师，2011年4月27日）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在农业农村部离退休干部局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丁玉华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40年来，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而“三农”事业则是这个奇迹的重要支撑。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为代表，创造了土地的“包干到户”（俗称“家庭承包经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粮食生产。粮食和各种农产品供应充足，市场稳定，起到了经济社会“定海针”的作用。农村改革成效显著，带动城市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历史性的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伟大的“历史转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会议被称为实现了“历史转折”。一个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党的生死攸关的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红军继续长征，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为了北上抗日，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从南方转移到了西北。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再一个“历史转折”就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为什么说这次会议实现了历史转折？

十年“文革”结束后，理想之船似乎有了拨乱反正重新起航的历史契机。但如何航行，往哪个方向发展？在当时有三种可能：继续搞“文革”那一套东西；回到“文革”以前的路子上去搞建设；另辟新的道路来搞社会主义建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发表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次全会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实际上实现了三个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对外开放；从墨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1949年以来的党的历史做了实事求是的论述，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顺利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是非非的过去做了一个很有远见卓识的告别。

历史性的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当新的经济时代来临之时，有一道门槛挡在那里，一时跨不过去。这道门槛就是怎样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之一，而市场经济则成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却束缚了我国经济发展活力，但要改变人们长期形成的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认识的惯性，又谈何容易。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初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词汇，彰显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14年的改革探索，终于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正像人们已经体会到的那样，市场经济是个万花筒。它带来了市场的繁荣，也带来了价格的波动；它带来了择业的自由，也带来了失业的风险；它带来了收入的普遍增加，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在市场海洋里学会游泳，还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开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特区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使整个国家焕然一新。绝大多数国民的财富大幅度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旅游输出国，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这是西方模式下多数民众财富20多年鲜有增长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0%以上，世界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关注一浪高过一浪。虽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还面临诸多挑战，但在国际比较中已经明显胜出，这条道路越走越宽。

进入新时代，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让人精神振奋，激情满怀。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践基础和现实依据。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而今天，我们充满自豪：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明天，我们更充分自信，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党的十九大确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一个时代的到来，总是以新思想、新方略为标志。一个时代的前行，必须有新思想、新方略指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宣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开启五大新征程：一是全面深化改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二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方式的新征程。三是进一步走向世界、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新征程。四是以人民为中心、迈向美好生活的新征程。五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深刻的思想、开阔的视野、豪迈的信心，引来与会嘉宾强烈共鸣，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党的十九大提出“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即中共建党百年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目标。具体讲是“新三步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0、2035、2050这三个时空的交汇点是中国人梦想与现实的转承点，是中华民族再创辉煌的里程碑。

（作者：原农业部离退休干部局长、高级经济师，2018年11月10日）

小农生产与农业现代化

杜 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了“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的目标。现在的问题是，在小农生产的基础上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这个问题的确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学界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国家也会有不同的路径和做法，但是，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一致的：一是要用现代的物质技术装备农业，包括良种化、水利化、机械化、信息化等，稳定提高农业的供给能力；二是农业经营要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学上讲规模效益还是站得住脚的；三是要有一整套贯穿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体系，以及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政策体系；四是要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其逐步接近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这一点是最根本的。

一、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面临的约束

与发达国家特别是新大陆国家相比，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面临两个明显的约束：一个约束在供给侧，中国农户属于典型的东亚小农类型。一是小规模。中国目前有 2.2 亿农户，户均经营规模只有半公顷，加上流转的土地，大约是户均 0.7 公顷。而美国 210 万个家庭农场的平均经营规模为 170 公顷，是中国的 240 倍；欧盟 15 个国家家庭农场的平均经营规模是 18 公顷，是中国的 25 倍。二是半自给。中国农户的农产品商品率在不断提高，但相当部分农户不是为卖而生产，而是在满足家庭消费后再出售剩余的农产品，带有半自给半商品的性质。三是兼业化。中国农户普遍兼业，且纯农户、一兼农户的比例在下降，二兼农户、非农业户的比例在上升，这种状况单就农业而言是不利的。四是非法人化。发达国家的农场主大都具有法人资格，而中国的农户大多是自然人，市场信用不够。当然，中国的小农户也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例如有精耕细作的传统，把有限的资源综合利用到了极致，这是新大陆国家的农民比不了的；又比如，兼业化拓宽了农户的收入门路，反过来使农业生产变得比较稳定，也使农户承受风险的能力变强等。

另一个约束是中国的资源禀赋特征——“人多地少水更少”。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农业适合生产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在生产土地密集型产品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这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产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

因为人多地少，所以，中国农业的户均经营规模小。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小农生产不利于引入现代生产要素，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导致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中国农业生产的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加速上升，中国农业进入高成本阶段，农产品竞争力提升面临新的挑战。以水稻、玉米、小麦这 3 种粮食产品的生产为例，2005~2015 年，中国这 3 种粮食产品的亩均生产成本从 400 元上升到 1090 元，名义增长约 1.73 倍，年均增幅为 10.54%，其中，人工

成本和土地成本名义上分别年均增长 18%和 13%。就人工成本而言，中国这 3 种粮食产品生产的亩均用工量是 6 个工，工价是 80 元，合计每亩用工成本为 480 元；而美国实施机械化大规模生产，虽然平均日工价（849 元，按一日工作 8 小时计）是中国的 10 倍多，但其每亩的用工量仅 0.38 个小时，亩均人工成本仅 40 元。这是导致 2004 年以后中国从农产品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的重要原因，也说明“适度规模+人工替代”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重要途径。

二、中国农业领域的重要阶段性变化

当然，也要看到，这些年来，中国农业领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阶段性变化，从积极方面昭示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可能前景，值得关注。

变化之一，是农业产业发生结构性变革。在农业结构性矛盾的倒逼和消费需求升级的拉动下，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变革。从横向看，农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其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内容之深刻前所未有，使不同地区的农业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推动着中国农业生产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朝着更加符合中国资源禀赋的方向发展。从纵向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入推进，不仅拉长了农业产业链条，拓宽了农业增长空间，而且为农业注入了新要素、新技术，使农业出现了新业态、新功能。这些变化对于从总体上提升中国农业的效益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变化之二，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截止到 2018 年 8 月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率达 36%，全国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计 300 多万家。其中，家庭农场 40 多万户，平均经营规模 170 亩；农民专业合作社 187 万家，入社农户 1.1 亿户；农业龙头企业 12.9 万家，带动了 1.26 亿农户；还培养了 1500 多万名新型职业农民。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不仅家庭农场的经济效益要明显高于一般农户，而且围绕家庭农场还出现了新型商业化服务组织。例如，江苏省泰州市建立了家庭农场服务联盟，为家庭农场提供“1+6”服务；又如，四川省蒲江县建成了服务范围覆盖全县的柑橘、猕猴桃、茶叶基地，有不少民营农业公司为家庭农场和农户提供全程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服务，完全采取收费的市场化经营方式。这说明，只要经营主体的经济效益提高了，就可以推动市场化社会分工的发展，这正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变化之三，是非农产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明显缩小。农村改革 40 年来，中国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值的变化，明显地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在 1978~2003 年这 26 年间，两大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先缩小后扩大，总体上维持为 6 左右，2003 年这一比值最高，为 6.85；“梯莫尔拐点”出现在 2004 年，在 2004~2016 年这 13 年间，两者的比值呈持续缩小的态势，从 5.95 下降到 4.09，差值缩小了 31.3%，说明中国已经进入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提升的新阶段[结果由笔者推算得到。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79~2017 年，历年，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究其原因，这主要得益于农业劳动力的持续转移、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的加快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中的重要变化还不止这些，但是，这些变化已经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提供了许多非常有用的信息。

三、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推进策略

中国要推进实现农业现代化，概括起来，笔者认为，其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统筹安排好国内农业的供给结构和生产力布局。这对于从整体上提高中国农业的效益和竞争力很

重要。其中的难点是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发展高附加值农产品关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不动摇，这是前提，中国不能学日本、韩国，大幅降低食物自给率。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更适合走“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农业现代化路线。因此，在新的条件下，应更准确地去理解粮食安全。粮食安全的根基是能力安全，核心是口粮安全，本质是食物安全。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和前提，中国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安排好国内生产，更主动、更自觉地去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第二，积极稳妥地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并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土地流转和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同时，要坚持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不搞“一刀切”。到2035年，中国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可望下降到15%以下，农户平均经营规模还可能扩大，但是，总体上看仍然属于东亚小农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突出重点，从中国区域间差异大的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区的产品布局，重点扩大主产区、特别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主产区的土地规模经营，该大的要让它大起来。二是主动引导和利用农户分化的趋势，建立以农耕者为主体的土地流转和经营制度，同时把培育核心农户和职业农民的工作抓紧抓好。三是在发展家庭农场的同时，同步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在专业分工发展的基础上，专业分工发展了，农户的微观效益和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益都可以提高。四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高度重视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在条件成熟时推动自下而上建立更高层次、功能更加完备的农民合作社联盟。

第三，进一步优化农业技术体系。这涉及两个选择问题：一是在农业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说增产技术就不重要了，而应该采取增产技术与节本增收技术并重的方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增产技术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农村改革40年来，中国的粮经比例从8:2调整为6.7:3.3，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1亿亩，但产量却翻了番，靠的就是增产技术。只有增产技术水平提高了，粮食单产增加了，发展高附加值农业才有保障。同时，也要更重视发展节本增收技术，大力开发机械、生物、人工智能、环保等农业新技术，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大技术”与“小技术”要实现结合。考虑到未来中国农户的经营规模有大有小，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要适应这种状况。

第四，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并不矛盾。农业是弱质产业，国家对农业给予支持和保护，更有助于农业进入市场，让市场机制在农业领域发挥作用。但支持和保护不应妨碍价格机制的作用，不应扭曲价格信号。为此，中国实施了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初步实现了“市场定价、差补分离”，效果是好的。从下一步的措施看，一是要持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农户经营的边际效益；二是要实行差别化的、更精准的补贴政策，向农业主产区和规模经营主体倾斜，提高补贴效率；三是要强化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组合，促进农业信贷、农业保险扩大覆盖面。

总的来看，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还是要谋求适度规模经营，核心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不能照搬照抄美国等国家的做法，而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走中国自己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

（来源：《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0期，总第406期）

改革开放农业机械化大发展

——在老部长支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宋树有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不平凡的四十年，是我国科技进步、经济腾飞、社会全面发展的四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收获是解放了思想，转变了观念。没有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形势，也可以说就没有我国的未来。改革开放纠正了发展农业机械化急于求成的倾向，确立了农民办机械化的主体地位，使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是决定我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一、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毛泽东同志把实现农业机械化，完成农业技术改革作为全党的任务提出来的。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在《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上，提出了“全党动员，决战三年，为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的口号。会议要求到 1980 年全国农业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 70%左右。

1978 年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此，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1980 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是不切合实际的，纠正了这一提法。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实现农业机械化，要积极有计划地开展农业机械化工作”。“农业机械化必须服从生产需要，从实际需要出发。”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制定了“从我国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有选择的发展农业机械化方针”。纠正了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脱离实际、盲目追求高指标的做法，使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走上了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二、确立了农民办农业机械化的主体地位

我国农业机械经营体制经历了国营—集体—国营的阶段。1958 年成都会议指出：“实现农业机械化，主要靠农业合作社的力量”，“根据合作社的财力，分别采取社有社营，国有社营，联社经营和国社合营等不同形式”。根据成都会议精神，决定将国营拖拉机站下放给集体经营。196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整顿和改进拖拉机站工作的决定》将拖拉机站收回，实行国有国营。我国的农业机械经营体制几经变革，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好办法，影响了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机械经营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1982 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即 198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小型拖拉机和小型机动船，从事生产和运输，对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是有利的，应当允许；大中型拖拉机和汽车在现阶段也不禁止私人购买”。农牧渔业部根据文件精神，印发了《关于加强农业机械管理工作的意见》，

要求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并存、完善发展合作经营、积极支持专业户”的方针，使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进入一个多种经营形式办农业机械化的新时期，充分调动了农民办农业机械化的积极性，确立了农民办机械化的主体地位。

三、农业机械化为发展现代化农业奠定了物质装备基础

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有四个明显特征：一是总体发展速度保持稳定；二是发展领域逐步扩宽；三是经济效应普遍向好；四是农机服务市场化已经形成。

（一）各类农业机械有了很大发展，构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物质装备基础。高性能、大功率的田间作业动力机械和配套农机具增长幅度较快，特别是大中型拖拉机、小麦联合收割机、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玉米收获机和保护性耕作机具的保有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二）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我国农业机械化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更大规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方向发展。2017年与1978年相比，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97245.6万千瓦，增长8.3倍；拖拉机保有量2317万台，增长12倍；联合收割机保有量190.2万台，增长100倍。综合机械化水平65.19%，增长3.3倍。农机作业领域也由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由大田农业向设施农业，由种植业向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全面发展，由产中向产前拓展，向产后延伸。

（三）农机社会化服务日益广泛，服务经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随着农业机械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农机专业协会、股份（合作）制农机作业公司、农机经纪人等新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涌现与发展壮大。农机社会化服务领域随之拓展，呈现出组织多样化、服务方式市场化、服务内容专业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显著特征。农机作业的订单服务、租赁服务、承包服务和跨区作业、集团承包等服务方式，满足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迫切需要，推动了农机服务市场化快速发展。

（四）农业机械化技术不断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农业机械化生产技术体系。国家通过推动农业机械化科技创新，实施国家科技攻关、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业科技跨越计划、引进国际先进农业技术项目等，加大了农业机械装备关键技术和装备的研制开发和扶持力度，解决了一些关键环节和技术集成问题。

（五）建立了农业机械工业体系，国产农业机械不但可以满足国内需求，而且还逐步扩大了出口。改革开放，农机工业通过转换经营机制，深化企业改革，支撑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农机对外开放领域也进一步扩大，成功的引进、消化、吸收了国外先进的技术，促进了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

（六）农机管理框架形成，政策支持体系初步建立，为农业机械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在农机化发展过程中，建立了包括农业机械制造、农机鉴定、市场流通、技术推广、技术培训、社会化服务、安全监理、管理指导等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农机补贴力度，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发展。改革开放，农业机械化法规不断完善，国家颁布了《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确立了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法律地位，使我国农业机械化持续健康发展。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实现现代化农业是亿万农民的愿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我们要充分认识实现现代化农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站在新的起点上，坚定信心、不断探索、深化改革，为实现现代化农业而奋斗。

（作者：中纪委驻农业部纪检组原组长，2018年6月27日）

农业对外开放与国际粮食援助

——在农业农村部离退休干部局召开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朱丕荣

40 年来，农业对外开放合作取得历史性进展，对推进我国“三农”事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以及为世界农业进步做出很好贡献。

因时间限制，我只讲两点：一是对外开放发展形势，二是利用国际粮食援助，推进缺粮贫困地区开发建设。

一、我国农业对外交流范围扩大，互动互信合作日益频繁。1978 年，与 50 多个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现在已扩展到 150 多个国家有双边交往，与国际组织，除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发基金会、世界开发署、世界银行、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外，与许多国际农业机构、地区性多边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如亚太、中非、中国与东盟、中国与欧盟、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中国与拉美、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外交（多极化）活动不断增多。

农业国际合作内容不断深化、规模扩大，成效显著。既有引进来，也有走出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农业技术援外、境外办农业、“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很快。技术、资金、贸易、人才、文化、政策等交流合作，农林牧副渔、一二三产业、社会、生态、气候、环境、法制等领域全方位展开，互利共赢，共同交流，不断前进。

中国农业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对外影响力增强。农业生产连续高速度增长，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7 亿多人口脱贫，成为国际扶贫典范。成为农产品国际贸易大国（世界第二位，农产品进口占世界第二、出口占第五位）。中国一贯倡导“南南合作”，“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谋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美好、和谐、进步、繁荣的新世界。中国对全球农业治理有了更多话语权。

二、利用国际粮食援助，增加自力更生能力，加快农业农村建设。联合国主张平等友好和平发展。1959 年有个决议，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 0.7%，来援助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多边或双边渠道提供）。1976 年唐山大地震，我国对国际援助是谢绝的态度。1979 年改革开放决策，为安置越南华侨 25 万人回来和河北、湖北发生大水灾，开始申请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粮食援助。1980 年正式加入该署，既是受援国，也是捐赠国（援助多，捐得少），逐步由紧急援助转为开发性援助（以工代赈、搞农田基本建设，按工程所需投入劳力，每劳力每天补助 3.25 公斤粮食），但施工工具、材料、种苗、运输等费用，由受援国配套资金解决。这方面我们过去搞水利建设有经验，能很好组织落实，因此成效显著，深得该署赞赏，并不断得到支持。从 1979 年至 2005 年（以后不缺粮，经济发展，就停止援助）止，该署共向我国援助 76 个援助项目，实

物折算共援助额达 10 亿多美元（平均每年达 3800 多万美元），涉及全国 31 个省市区，项目区直接受益人口 3000 多万人。内容包括水利，改造低产田，山区开发，植树造林、农村交通、饮水工程、沿海沿湖城郊的水产养殖，其中还有一个六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西安）奶类项目，提供奶粉 4.5 万吨、黄油 1.3 万吨，制成再生奶或酸奶，销售后收入用于郊区发展奶业生产加工体系。

受国务院委托，世界粮食计划署业务责成农业部统一对外，对内归口协调管理，外交部与财政部配合支持。既要做好与该署和捐赠国的合作关系，又要更好为各地方和部门合作与服务，管好项目，争取国际好评。我们曾与当时扶贫办朱荣同志商拟一个利用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的规划，确定 20 多个项目，考虑地区重点，合理布局，于 1987 年 5 月由农业部、国家计委、财政部、经贸部、外交部联合发文，部署各省市区做好项目准备、设计安排，报农业部考核，视机对外申请。并注意总结交流管理经验和组织捐赠国代表现场参观，扩大影响，树立良好对外印象，保证提出的每个项目，都获通过批准。

但是在对外报导中，突然出了大问题。1984 年粮食丰收，1985 年我国广播、电视、报刊，包括英文中国日报，均宣传农村粮食卖不掉，仓库放不下，同时成为粮食纯出口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就向我方指出，如果中国不缺粮了，将停止对中国的粮食援助。我们积极向该署说明这是媒体只看偶然丰收现象。实质上，中国人口多，水土资源紧缺，人口城市增加，生活改善，要发展养殖业，食品、饲料需求在增长，目前人均粮食水平是 400 公斤（相当于世界水平），储粮基础设施差。地区不平衡，自然灾害频发，丰欠年不平衡，还有 1 亿人缺粮贫困，出口一些大米、换取进口小麦（大米价比小麦贵），为了品种调剂，粮食问题没过关，正努力要控制人口增长，保护好土地资源，更重要的是积极提高粮食单位产量，并注意节约用粮，任务艰巨。为了扭转对外报道的夸张所造成的错觉。1986 年 5 月特邀请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执行主任英格拉姆先生访华，请当时赵总理和何康部长，阐明中国粮食问题的实况与前景，得到了对方的理解，同意继续支持中国的粮援项目。1986 年 9 月又组织捐赠国代表来华参观粮援项目成效，并考察贫困（山东临沂）地区的实况，证明地区差别发展的不平衡。

欧盟奶类项目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六大城市奶类项目，从 1983 年 8 月开始执行（1989 年底结束），效果很好。1986 年畜牧局接着提出，希望继续扩大建立二期项目。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支持，可允请提供奶品资源的欧盟（捐赠国）直接与中方商谈。1986 年 9 月欧盟主管援助的代表，应邀来华与农业部会谈，我代表部向他阐述，中国人均牛奶产量只 3 公斤，大中城市供应紧张，婴儿、病人均需开证明，实行计划定量供应，有的青年职工妇女向市政府请愿，抱着小孩要求供应牛奶，同时外国人到中国旅游喝不上牛奶，很有意见。中国奶业是个薄弱产业，需要加快发展。这是改善营养、增强体质的迫切艰巨任务，希望欧盟继续给予直接援助。他表示完全理解并给予积极考虑，希望农业部门通过经贸部提出申请立项。就此，畜牧局提出了：除原六大城市外，增加了广州、沈阳、重庆、成都、青岛、福州、杭州、合肥、长沙、南昌、大连、桂林、苏州等共 20 个城市，要求仍援助奶粉 4.5 万吨，黄油 1.5 万吨，加工成再生奶。售后回收资金用于发展这些城市的牛奶生产体系。这个项目于 1986 年 10 月通过经贸部向欧盟提交，1988 年 3 月得到批准，总援金额为 1.01 亿欧元。

1992年初，畜牧局又提出新项目，要求增加新疆、贵州、甘肃、黑龙江等一些地方发展奶业（欧方援助698万欧元，约3000万元人民币），1993年1月批准。1992年3月，再次向欧盟提出奶业食品加工技术和商务合作项目（由欧盟援助3000万欧元，即3亿人民币）的财政技术援助，于1996年获得批准，1998年开始执行。1993年3月畜牧局借鉴印度发展水牛奶经验，在广西、云南、广东等地实施，欧盟援助278.7万欧元（约3000万元人民币），于1996年获得批准。

以上四项，欧盟共援助1.4亿多欧元（约8亿元人民币）这是奶业建设的很大投入，推进我国奶业发展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德国粮食援助。1986年9月我们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主要捐赠国代表参观江苏洪泽湖水产、安徽淮北土壤改良、山东聊城造林项目效果时，专门安排去贫困缺粮的山东临沂山区沂水县考察。代表中有位德国经济合作部主管粮食援助的司长曼巴先生，他看到一个贫困山村农民生活困苦，饮水要到4到5公里外挑水，年轻姑娘不愿嫁到这里来。对此很受感动，当即向我表示，愿意给予援助，要我们即作项目准备，待他回国后，再告办理申请手续。事后，我们即请山东省和地区来京商量，重点在沂水、沂南、沂源三个县的山区解决缺水 and 山区综合开发治理问题，提出项目申请，通过经贸部向德方递交。1987年4—9月间德方先后来考察评估，于10月即获批准，由德方提供800万马克和3.5万吨小麦的援助，1988年1月开始实施，1991年4月完成，解决了16万人口和14万多头大牲畜饮水，治理小流域45条，扩大灌溉6000多公顷，修路591公里。由于执行得好，1991—1994年把项目继续扩大到11个县，称为中德合作山东粮援项目，到1997年止，德方共提供小麦18.2万吨，3700万多马克（合4.5亿元人民币），直接受益人口150多万人。德方还不断给予文化与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的额外援助，称赞这是个模范项目。

日本粮食增产援助：1982年，日本民间人士奥山道夫先生，通过我驻日使馆介绍，来农业部访问，我接待了他，他诚恳地通报，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粮食（大米）增产援助，用于水稻育秧、机械化栽培机具和农药、化肥、收割机等生产资料，促进大米增产。每期援额为5亿至7亿日元，并带来了有关项目信息资料，建议我们主动提出申请。当时我是中日农业科技交流工作组的中方代表，与农林水产省和国际协力事业团有些好朋友，谈及此事后，他们很支持，然后通过科技部和经贸部向日方正式递交项目书，获得批准。从1983年起，先从吉林省开始，以后安排辽宁、宁夏、新疆、青海、内蒙、河北、甘肃等北方水稻区，逐步向南方地区选点，持续到2000年终止，共进行了13期，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的20多个重点县，总计援助金额达94.7亿日元（约7500万美元）对于我国水稻技术改进和机械化生产，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利用国际粮食援助，在项目区努力下，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并获得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好评，起到了为民造福，为国争光的作用。

（作者：原农业部国际合作司长，2018年11月22日）

中煤神州永清籽粒苋基地参观感

陈幼春

在蛋白质含量上，种植籽粒苋有什么优势呢？本文就有关问题做一个对比如下。以两者各自的蛋白质含量、含水量、单位面积产量、估计每亩产量和实际产量为指标，进行对比，如表：

籽粒苋和大豆的蛋白质生产情况对比

	含蛋白量%	含干物质质量%	每 100kg 湿重产 kg	单位面积饲料总产量 (按每亩计) kg	实际干物质产量 kg
大豆	35	97	30.45kg	200	60.9
籽粒苋	16	10	14.4kg	20000	320

注：产量以一般认可的指标计算。

按各自每百千克的蛋白质含量来说是大豆高，两者相当于 35%比 15%，或是 2.2 比 1，然而大豆以亩产 200kg，⁽¹⁾与籽粒苋亩产 20 吨来说，则两者各自产出为 60.9kg 与 320kg，是 1 比 5.26。就是每单位的蛋白质生产量是籽粒苋比大豆高 5.26 倍。自然，大豆尚具有高脂肪的特征等，两者各自具有不同的饲料特种，各有其生物学优势，不完全具有完全可比性。本文只是就一项营养指标举例。据孙鸿良教授报道全株青饲料折合干的蛋白质含量，最高可达 756kg；在山西五台山高洪口乡卵石滩开荒地亩产就达 15 吨青饲料，即亩产 240kg，十分可观⁽³⁾。可见其在饲养动物时的优势。

籽粒苋进入大田生产都是当前的趋势，前者是民众所想，并且成为政府提倡。是“粮改饲”的最佳选者之一大豆在主产区的东北如此，在其他生态也如此。它是民众的食品，是饲料。籽粒苋是正在发展。由 30 年前在科研的推动的引发，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的引种、保种、推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畜牧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山东高密的试验基地；进而在山西五台县的扶贫（中扶惠邦）项目；在河北永清中苋（中煤神州）及内蒙古库布齐沙漠（中煤神州）等处，由科研到事业，再到企业不断发展。由小面积到规模生产，终于形成大面积籽粒苋大田生产。最近在新疆伊犁地区引种成功。

2018 年夏对中煤神州基地的这次考察学习，原本以为中煤神州公司永清基地今年能种植 2000 亩，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已经种上了 30000 亩，从试验到大田，从弱势开发到强势冲击，从单一的农艺试验的播种，到完善生产链：机械化收割、打包和堆堆。试看那青贮籽粒苋玉米秸混合打的青贮塑料包（每包一吨重）场地，是成推、成摞、成行地排放着场面起势飞宏。经历了是不平凡的 30 年，尤其是这 2~3 年，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可喜可贺！基地只有 2 万亩土地面积，为何种了 3 万亩。原来是当地党政领导表示支持，联合农民

土地的面积。为此增加了一万亩的种植面积。可见情况良好。

为了做强这种新介入的作物产业优势，有几点建议：

一、要扩大种植面积，当前必须“不断扩大，上不封顶”，使种植结构中的各项作物比例自然调整，逐步定盘。如该公司在9个省区发展联营企业，是有谋之举。目前如玉米的种植面积因为经济效益的关系，人们不断退出籽粒玉米种植，向全株营养玉米发展，为青贮玉米生产提供饲草。成为“粮改饲”的首选，在传统的三大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中，保证前两者，放开后一种，是农业结构侧调整的生动事例。又如薯类被列为粮食作物，其实，马铃薯是做成糕点也好，做菜也好，都是食物，有人要将它列为粮食作物，可以讨论。粮食 food 一词是窄义上的含义，食物是 food 的广义上的含义（见“论 FAO 中文译文含义的变化与后续效益”）⁽²⁾ 食物的概念是一种升华，更符合食物与农业组织中 FOOD 一字的本意（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的本意，翻译文应该为“食物与农业组织”。

2015 年政府启动了粮改饲试点。2017 年农业部商业财政部制定的《粮改饲工作绩效评价方法》，以进一步落实该行动。当年已经推广到 17 个省（区）。2018 年的规划又在“镰刀湾”地区，黄淮海玉米主产区进一步推广，要实施 1200 万亩面积。有关地区，提出“粮仓+奶罐+肉库”的号召，要“稳粮、兴经、扩饲、强畜”成为当地的新理念。种植籽粒苋可以强化粮改饲的进度。

二、要参与饲草种类竞争，制定质量标准。孙鸿亮等报道，在华北、东北农区籽粒苋亩产 15 吨~20 吨；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平均鲜草亩产 7 吨，按一般说比紫花苜蓿单产高 134.8%。籽粒苋初花期叶片的蛋白质含量为 21%~28%（因品种而异），茎秆为 8%~16%，其叶，同时紫花苜蓿的叶和茎的蛋白质分别为 26.6%和 10.2%。⁽³⁾ 由于各自具有的品种在农艺性状上特色并不一样，且多年生与一年生不同，接茬的植物不同，尽管都是高营养，必须制定出本身的质量标准和出场标准；提供农艺特征和管理要就跟上。

三、要定商品标准。据报道，籽粒苋有七大品种，其中有五个为常用。在全国九个省市区的十多个地县旗推广⁽⁴⁾。要打出各种公司的商品标准，为成品提供基准数据，提出推荐、介绍提供说明书。

四、要检测 DNA 指纹序列。有了商品标准，在当前科技水平，知识产权的所有权的保证，尚需要有 DNA 指纹序列的证明。如首农和中信收购英国樱桃谷鸭有限公司 100%股权，包含 DNA 指纹序列，该收购后，樱桃谷鸭的种鸭基因的知识产权才一并回到了祖国。此前，买樱桃谷鸭，每年中国要向英国支付 15 亿元人民币。樱桃谷鸭是“中国血统”，又重新是原来的北京鸭了⁽⁵⁾。可见，DNA 指纹序列测定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五、要开发籽粒苋食品。墨西哥的第一届粒苋会议就用籽粒苋粽子招待客人，与玉米混合做烤饼。在美国含有籽粒苋的饼干其售价比普通饼干贵百分之三十，而且有色拉、面条布丁等，不一而足。在俄罗斯生产提取籽粒苋赖氨酸的保健药品。在日本出售苋原粮，与大米合用作为保健食品。⁽⁶⁾ 在我国上世纪 90 年代开发过苋米饵粉、苋酱油、苋参米酒、苋挂面等等。称：具有明目、利尿，顺解、益气、去寒热的功能。据岳绍先报告由于籽粒苋富含赖氨酸，脂肪酸中 70%~80%为不饱和脂肪，含有 7%~8%的角鲨烯的成分，含铁、钙、锌

的量比面粉高 7 到 10 倍。以及天然色素的来源，开发成为人用食品，前途广阔。^(6、7)

六、要开辟航天员食品。永清中菟公司在开发无粮喂猪实现日增重 700g 以上的成绩后，在品尝猪肉过程中，引来了航天业界的客人。他们对这种猪肉感兴趣，随意挑中一头，取得的肉进行了品味，初步认定这种肉是他们航天员所需要的。这种肉在分割以后脂肪部分挺拔，像用大麦饲料喂养出来的猪肉。不像市面上供应的肉油性很大而且熟了以后肉质虚软。有一定的，可取的品质。应该进一步试试。

七、要在扶贫工作上做贡献。全国强则企业强，企业强则敢要为精准扶贫做贡献。我们要共同为实现 2020 年全国达到小康水平而努力，使之“时到成功”。

八、要组织科技团队。为研发生产需要的技术，成为商品，必须有本公司的技术队伍，有利于和科研机构的力量合作，以成大业。

九、要联网开发。发挥信息化时代的优势，强化企业本身的实力，又掌握各界动向，全国网络信息的应用的意义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言。

总之，永清中菟公司杨涛先生提出的要保证食品安全的宗旨是必须肯定的。绿色、环保，绿色农业，永葆青春。

眼见为实。永清中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的运作和进步是具备“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绿色农业的要求的。能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做出贡献。这次学习受益匪浅，并能为此项目继续合作和努力而高兴。

诗云：老马嘶鸣，乐在晚晴，有生之年能与老友们共同为项目提供绵薄之力。以上不妥之处请多多批评指正。

【注】：

- (1) 张子仪 “大豆”.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畜牧业卷. 122~123. 1996, 农业出版社
- (2) 陈幼春 “FAO 中文译文含义的变化与后续效益”. 专家天地 2014 年 5 期 7-8
- (3) 孙鸿良 岳绍先等创新技术带来籽粒菟优质青贮饲料面世. 中国畜牧业 2016. 12 期: 47~49
- (4) 孙鸿良 岳绍先 郝凌宇等籽粒菟的高产抗逆特性及其开发优质高效青贮饲料的关键技术. 中国饲料 2017 年 17 期 10~13, 20
- (5) 张 钦 首农中信 15 亿接回“北京鸭”. 北京青年报. 9 月 19 日
- (6) 岳绍先 孙鸿良 常碧影等籽粒菟的营养成分及其应用潜力. 作物学报 87, 3, (2): 151-156
- (7) 孙鸿良 岳绍先 籽粒菟食品纳入营养健康产业的发展趋向. 中国种业, 2017, 5. 11-14

(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七论践行“三农”必须强、富、美

——依据形势条件改革早期试点经验, 实干十年基本实现目标

李毓堂

【前言】2018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 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把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目标定在2050年。笔者认为, “三农”发展需要稳中加快, 不必将全面实现强富美的时间放在32年后, 这是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全局战略步调不相一致的。笔者就又快又稳又快实现“三农”强富美问题, 从形势紧迫、基础条件、改革早期试点实践启示等方面作初步探讨, 提出稳快实干十年实现“三农”强富美的战略思考与建议。

一、国际新一轮生物技术革命与农业竞争形势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态势, 不允许我们把实现“三农”强富美推给下一代

(一) 世界农业在近一个世纪经历了以工业化学为主技术推动快速发展后, 已陷入水土污染、产品退化、环境恶化的不可持续危机。正如钱学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预言, 人类正进入第六次以生物工程为主的农业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新时代。

美国战后利用工业发达优势推行化学农业, 取得农业霸主地位。然而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农药、除草剂和抗生素等, 已造成水土污染、环境恶化、食物品质下降、国民疾病增多、乡村美丽景色不再的危机。

德国2015年爆发5万农民开着上百台拖拉机聚集柏林示威游行, 诉求是“反对日益工业化农业”。即种植业用大量化肥农药追求产量和工厂化养殖大量使用抗生素造成环境污染、食物品质下降、危害国民健康。口号是“我们受够了!”

日本原是珍惜鸟类朱鹮的原繁衍栖息地, 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以至朱鹮遭到毒杀和栖息地破坏而绝迹。后来重新从中国陕西引进。

目前发达国家正着力开发农业生物新技术向生态农业进军。美国已加大农业生物技术研发应用, 大批量生产推广生物农业材料及配套设施, 欲以新的优势维护其“以粮食谋霸权”战略。

(二) 我国农业半个多世纪以来追随西方化学农业发展模式, 导致污染及其后果比西方国家更为严重。目前我国化肥单位面积施用量相当世界平均水平3.5倍, 增效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化学农药、地膜、除草剂、抗生素等施用量及产量位居世纪之最。由于化肥、化药有效成分仅为30-40%, 其余60-70%成为残留有害物质污染土壤、水体、大气环境, 造成耕地退化, 农产品质量下降; 农业成本上升收益下降; 国内外价格倒挂, 竞争力减退; 农畜产品进口率增高, 自给率降低; 农民人均收入同城市人均收入实际差距连年扩大

（实际差额由 2010 年的 13612 元扩大到 2017 年的 25266 元）；农村生态环境受工农业面源污染、养殖排泄、生活垃圾污水等危害严重恶化。在世界新一轮生物技术革命和农业竞争大潮中，我国如果不甘于落后和受制于人，就必须加快“三农”强富美步伐。

（三）从国内发展形势看，40 年来科技、国防、工业、商贸通过深化改革创新已跃居世界前列。“一带一路”倡议践行才五年，就取得光跃全球的业绩。唯独农业现代化和“三农”发展改革创新滞后，一直是“四化”建设中的“短板”，已日益严重影响到国家粮食和食品安全，影响到城乡收入与建设的谐调平衡发展；影响到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影响到整体生态环境文明建设；最终影响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达到世界强富美前列的大局战略。

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三农”强富美的步伐，要尽快建立绿色生态农业综合发展体系，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社会化规模化新型农村集体经营体系，“三产”一体化大农业循环经济体系，城乡收入与建设协调发展保障体系；以适应“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全局战略要求，确保我国以创新发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立于世界强富美国家前列。

二、我国现已具备全面加快实现“三农”强富美的基础与条件

（一）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明确目标；有小平同志预示的“二个飞跃”体制改革方向；有钱学森提出的生物新技术与大农业产业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科学路线图。这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二）有几千年发展生态农业的传统经验；有四十年来科研积累的生物技术和科学管理创新成果。它们都具有现实针对性，如各种生态农牧业循环模式：作物-绿肥-作物，粮豆间作（轮作）-除莠-改土，稻-鱼-鸭，猪-沼-草，草-畜-肥，林-草-鸡，饲草-养殖-改土，秸秆菌剂发酵优化-养殖-沼肥等。又如生物肥料、植保新技术：生物颗粒肥、微生物菌肥、光合液膜肥、GPIT（植物表型诱导调控表达）光合增效剂、生物地膜、植物源除虫剂、太阳能灯光灭虫、招引粉红椋鸟灭蝗、牧鸡灭蝗，繁育无害卷蛾、萤叶甲虫灭豚草，低聚糖生物农药、脱落酸作物抗逆素、壳寡糖生物抗生素以及复合缓控释肥、纳米农药、农药催化剂等。还有正在兴起的：转基因育种，粉垄作业，植物声波增效，CO₂气肥，植物微生物治理化学污染重金属残留，以及信息化生产管理、网络化营销技术等。这是成功的技术基础。

（三）有建国以来农业经营体制变革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是农业体制改革二次飞跃成功的明鉴。

（四）有雄厚的国家经济实力、科技队伍和农草林沙海国土资源为后盾，是成功的物质和人力保障。

（五）有习近平为首党的英明领导，有 8 亿农民的凝聚力，有全国人民的支持，这是必胜的组织保障。

三、早期试点实践对加快“三农”强富美步伐的启示

改革开放初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笔者在农业部具体主持草地管理和建设发展工作。在建立草地管理建设十大基础体系基础上，在全国十多省区二十多处试点开展了农牧区草地牧业综合发展示范项目。项目针对农牧区存在的小农（牧）分散、技术落后、收入低下，发展缺乏资金物力人力和种、养、加、销脱节等老大难问题，依据小平同志关于农业发展指示和钱学森关于第六次技术与产业革命理论，参照国内外农工商一体化经验，采取综合治理系统工程方式，从改革农业技术、经营体制、产业结构入手，发展以家庭农牧场为基础，农（牧）工商服务中心（公司）为龙头的大农业经济联合体，力求达到农牧业生产现代化，农民增

收致富，农村牧区繁荣发展。现今看来，可称作“三农”（牧）走向强富美的早期试点。

项目运行方式概况为：围绕一个目标，实行三个三结合方针，采取五项改革措施。

一个目标：发展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农（牧）业经济。

三个三结合方针：种植、养殖、加工相结合，生产、科研、培训相结合，农（牧）工商相结合。

五项改革措施：1. 改革农业经营体制：以邓小平预示精神实行“两跃”结合，发展适度规模家庭农（牧）场为基础，农（牧）工商服务中心（公司）为龙头的新经济联合体。2. 改革生产技术，在种、养、加、销各环节应用循环配套的先进技术。3. 改革经营管理：制定投资效益经济核算、技术经济指标、操作规程、质量标准、检验监督等规章制度，优化四大管理（社会、经济、技术、生态）体系。4. 改革流通渠道：使产品顺畅进入商品大市场。5. 改革组织领导方式：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实行企业式系统工程组织领导方式，防止按长官意志行事。

项目按照上述操作，大都达到三年投资建成，五年见效验收。多数家庭农牧场在农牧工商服务中心提供有偿资金、生产资料、技术培训和产中服务的支持下，发展成为规模适度、技术配套、产品优质高产、收入成倍增长的富裕户（很多达到当时的万元户），并有能力按期偿还投资。服务中心（企业）建立起农畜产品加工、商贸、科技服务运作体系。项目区经济、生态、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通过项目建设，老少边牧山区涌现出了一批综合发展脱贫致富的典型模式。如：贵州省贵阳市郊石漠化区，由家庭奶牛场和牧工商服务中心联建的种草养牛——牛奶加工——市场销售脱贫致富的花溪模式；内蒙古达拉特旗贫瘠低产区，由家庭农牧场和牧工商服务公司联建的引黄灌溉——种草种粮养畜——农牧双丰的五股地模式；新疆富蕴县草原退化游牧区，由家庭牧场和牧工商联合企业共建的人工草地储草——自然放牧——羔羊（公）当年育肥出栏——肉类皮革加工——门市营销的双赢致富的富蕴模式；新疆阜康草原荒漠区，由定居家庭牧场和牧工商服务中心联建的引渠灌溉种草——定居放牧——畜产品加工营销共同致富的阜康模式；湖北省恩施州贫瘠山区，由家庭奶牛场和牧工商服务公司联建的种草养牛——牛奶加工奶粉——门市销售脱贫致富的大山顶模式；贵州省威宁乌蒙高寒山区，由家庭羊场和甘肃草原生态所科研基地联建的种草养罗姆尼羊——划区轮牧——畜产品优质高产增收致富的灼圃模式等。它们都得到现场考察的中央、部委、省区领导人的赞评和国家审计部门的审计调研认证。项目总结创立了“草产业系统工程理论和基本模式”，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对此，钱老在 2003 年给笔者的信中说：“我于 1984 年提出创建知识密集型草产业的观点，至今快二十年了。这个观点有幸得到草业界学者的赞同，你们将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草业，即提出了一些新的草业学术思想，又进行了成功的试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就此，笔者曾于 1991 年应美国第 44 届草原管理学会特邀出席大会时，同 A&M 大学教授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引起很大兴趣。

早期试点成功实践，对现今加快“三农”强富美步伐，可有如下三点启示：

启示一：步子能否快，首要路子对。

早期试点为什么能做到三年建成五年见效？请听中央、部委、省区领导专家们的现场评论：

胡耀邦总书记 1990 年视察恩施大山顶示范项目区时说：“项目通过种草把荒山变成丰美牧场，发展了家庭奶牛场，又建立了奶粉加工、销售和科技服务公司，做到了种草养畜加工销售和科技服务一体化，真正达到了改造山河治穷致富，为南方山区发展作出了示范。”

赵紫阳总理 1991 年现场视察恩施大山顶项目区时说：“综合发展路子对头。现在是小效益，将来是大效益。”

政治局常委宋平在现场考察伊盟示范项目区时说：“你们现在开发改造的路子对头，进步也很快。潜力大，后劲大。”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在视察威宁和贵阳示范项目后两次接见笔者等人，说：“项目取得的成就和展示的前景，对贫困山区农民如何脱贫致富很有指导意义。”

新疆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对富蕴牧工商联合企业示范项目评价说：“经验很好，很好！我们牧区要富裕起来，牧民要富裕起来，看来还要走牧工商联合经营或者说综合发展的道路。”

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领导和专家多次赴北京、河北、天津、山东等地考察示范项目予以肯定。研究会会长、边疆部长在考察北京密云项目研讨会上说：“项目区原来条件并不好，只用三年时间搞到这种程度，是相当不错的。项目所搞的以服务公司为龙头，家庭牧场为基础，以生产、科研、培训相结合，种草、养畜、加工相结合，产、供、销相结合等三个三结合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联合体模式，不仅适用于牧业，对整个农业来讲，也是个极好的启示。”

启示二：快步能否稳？在抓精准狠。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稳中求进方针”。“稳”，应是不出大错不走弯路顺利达到预期目标。早期试点为何能在三至五年快步达到预期目标？请看 1991 年国家审计部门对项目审计调查报告结论：

“草地牧业综合发展示范项目经过三至五年的建设，已陆续进入收尾阶段.....。审计调查情况表明，项目建设是成功的，项目建设实行了产供销一条龙、牧工商一体化，突出重点，注重效益，把投入资金主要用于种草、养畜、加工、增加基地配套基础建设、强化科学技术手段、提高技术服务等项目上。资金的投入方向是明确的，资金的运营也较合理。多数建设项目都已按期完成，并初见成效，为促进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畜牧业转变，向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方向发展探索了一条新路。”

“投资效益评估：

（一）经济效益。1. 提高了农牧业生产产值（略）；2. 牧业生产得到改善，缓解了草畜矛盾（略）；3. 发挥了牧工商为龙头的流通体系作用，初步形成了服务网络。

（二）社会效益。1. 科技兴农，科技兴牧（略）；2. 提高了农牧民收入。据十四个项目调查，农牧民基本上从贫困中解脱出来；3. 起到了示范作用（略）；4. 建设区周围农牧民得到很大实惠。水电设施解决了灌溉、照明、动力等问题，昔日荒地建起幼儿园、小学校。

（三）生态效益。项目建设大大促进了生态环境改善，使过去一些不毛之地披上绿装，退化盐碱地变成高产人工草场，严重沙化荒滩变成半人工草地，边远牧区营造了防护林，使风速降低，风沙灾害减少，生态系统开始向良性循环。”

同时“审计报告”也指出少数试点项目由于未按项目计划严格运行，存在配套资金不到位或不及时，或建设超计划、超规模、或牧工商服务体系不健全，商品流通不畅，甚至发生资金被挤占挪用等问题，都造成项目延迟不能按期建成。

以上审计调研报告说明：要做到步子又快又稳，关键在精细准确狠抓项目计划落实工作。早期试点项目能在三至五年内达标，是做到了：一有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给力；二有自上而下建立的项目管理组和技术组的掌控指导运行；三有一线科技人员配备和对农牧民及时培训，形成基层科技劳动大军，保证各项建设运行到位。

启示三：龙头须创新，集体自经营。

从早期试点项目验收后的发展看，由政府组建的农（牧）工商服务龙头企业，由于受体制与权责利分割所限，很难担负起持久扩大发展现代家庭农（牧）场和“三产”一体经营，保障广大农民致富的历史重任。而现今的民营个体农工商企业也难以担此重任。唯有农户组织起来，在政府支持下，联引社会力量，创建新型集体经济自主经营的“三产”一体化龙头企业，才能把家庭承包和集体经营的权责利统筹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保障整体农民增收致富。

四、稳快实干十年实现“三农”强富美的战略思考与建议

如上所述，世界新一轮生物技术革命和农业产业竞争形势，不允许我国把实现“三农”强、富、美拖到32年之后；国内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局战略，也不允许把实现“三农”强富美拖到32年之后；我们现已具备全面加快“三农”强富美步伐的基础条件。参照早期试点启示，精准狠地大干十年，一定能够又稳又快达到习主席指示的目标。由此建议：

（一）明确科学路线图：以邓小平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二次飞跃预示和钱学森第六次生物新技术与大农业产业革命理论与实践为科学路线图，破解目前农业化学污染、小农经营困境、一产结构低迷等三大危机，创立农业型知识密集型五大产业体系。包括：以生物、信息、机械、系统工程技术为主的生态农业生产体系，规模化社会化新型集体经营体系，三产一体化大农业循环经济体系，使“三农”基本达到国际一流强、富、美水平。

（二）加强组织领导：从中央到地方确实把“补短板、强弱项”，深化改革创新，加快“三农”强富美步伐，列为“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来抓。从顶层设计、战略举措、方针政策、财政金融、法制管理到队伍组织，制定总体规划、年度运行计划和科学务实措施，动员全党全民力量付诸实施。

（三）愿景展望：在建国八十周年时，我国将实现社会主义特色农业现代化，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基本步入世界前列。国家农业竞争力增强，粮食和食品安全持久稳固；国土生态环境整体改善；扩大内需和劳动就业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城乡收入与建设得到协调平衡发展；社会三大差别逐步消除；中华民族复兴的灿烂光辉普照全球大地。

加快“三农”创新吧，我的国！胜利就在前头！

（作者：高级经济师、研究员，国务院颁发农业技术突出贡献证书及政府特殊津贴，英国皇家联盟科学院荣誉院士；原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研究员、牧区办主任，国务院京津冀周围绿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生态文明与比较视野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温铁军

中共“十九大”之后,海内外都在讨论关于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一些新提法,本文主要对两者内涵及其相关性做出阐释。

一、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农业文明演化的决定性影响

近年来的科学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的变迁主要受到气候冷暖变化的制约。

竺可桢是民国时期学业有成的科学家,新中国就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他在半个世纪之前中国人普遍相信“人定胜天”的时候就提出过历史沿革受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的论断。他提出的朝代周期理论在当时还未得到充分论证,但却被近年来世界上对全球气候暖化高度关注从而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证明,人们已经研究出了气候变化的长周期。只要把气候变化周期和人类发展变化周期结合起来就能发现,今天的很多说法几乎都可以作为“八卦”来看——比如说商朝的陷落是因为商纣王宠幸妲己的荒淫无道。那么,历史真实是什么?

人类在漫长的农业文明之中,气候只要变暖,就会导致农耕文明向北扩张;相反,气候只要变冷,就意味着游牧民族全面南下。人类不同生存方式的向南和向北的移动,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化。

农耕文明在亚洲是灌溉农业,人们要聚落而居,需要大量劳动力共同劳作,因此多子多福,安土重迁。这本来不是一个负面的概念,而是一种生态、生活、生产三位一体的农耕文化存在的方式。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宽阔的草原上一定是移动的,逐水草而居就不能常住。一旦北方变冷,地面冰雪覆盖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就得全面南下,抢掠农耕民族贮藏的粮食——同时还砍人,把地留下来放牧牲口。不过,由草原而来的游牧文化到山边就不走了。中华民族的农耕社会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因为游牧民族南下挤压农耕社会,逐渐向南进入山区,中原大族举家南迁,进山进沟,躲开了杀戮灾难。所以南方的大姓,如广东的陈姓源于陈县,福建林姓源于林县,都能在中原找到根。

客观地看,农业稳态社会和游牧流动民族之间是一个长期互动的过程。每当气候暖化,农业社会也会发生对游牧民族的驱逐。比如汉武帝逐匈奴于大漠以北之后,匈奴部族事实上沿着亚欧大陆往西边去,把欧洲北方部落向西南部不断地挤压,进而西欧北方的日耳曼人被挤压进入了意大利半岛,成为病入膏肓的罗马帝国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演化出东西两大文明早期互动的起因,在于气候变化造成南北两大文明的互动从而导致世界发生了结构性改变。这些随着气候变迁研究而提出的人类历史演变的新假说,仍然需要大量研究来证明。

为什么说气候冷暖变化与人类社会变迁的研究和生态文明相关?因为,生态文明本身就是由气候变化所形成的人类社会结构变化而引起的生态变迁。中国东部的农业如何由原生农业不断拓展,最后演变成了东北亚和

东南亚的次生农业?原因就是生态条件:人类最早是在亚洲大陆的两端形成早期农业的生产方式。

在亚洲西端是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约 10000 年前形成的原生农业,伴随气候暖化而向欧洲拓展成为次生农业。因为西亚两河流域面积狭窄,所以形成的是以单一作物小麦为主的食物体系。今天这个世界上,由于西方殖民化扩张,造成整个北美、南美乃至整个澳洲、大部分非洲,都以小麦粉为主食,其根源就在西亚两河流域原生的小麦农业。

在东亚则是四河流域,即江淮河汉,也可以用“四河文明”的稻、黍、豆、桑四大作物来代表东方对人类农业文明的四大贡献。这主要是因为东方四河流域面积宽广,又是沿着三级地理台阶而下,且被五大气候带所覆盖,所以东方农业在距今 12000 年前的起源之初就是多样化的。原生中国的农业品种占全球 20-25%。但在向东北亚和东南亚拓展出去的次生农业地区,则是稻米为主。

亚洲大陆之所以长期是多神崇拜,多教融合,可能与气候复杂变化之下农业资源丰富,家庭男耕女织种养兼业,村社能工巧匠、十业并举的多元化生存方式相关。例如,重庆市北碚区有“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这个陈列馆创办人家里有座小庙,庙里面什么神都有。这个西南地区的情况,与十多年前在河南看到的情况一致。这些现象说明本来具有多样性的农耕社会的民间信仰就没有西方一元论宗教所具有的那种极端排斥性。长江上游的巴渝山区如此,长江下游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也如此。村内的公园也是什么神都有,耶稣和穆罕默德在农民那里不对立,都同样可爱,这就是与自然界多样性协调一致的农耕文化中的多元崇拜。在亚洲东部儒家文化地区,至今都是儒道释不分家,与各方面的神都和平共处。

农业社会的多元性,决定了人们精神信仰的丰富多彩。伴随近代西方殖民扩张,单一神教强势传入中国,内地排斥民间多元信仰,不断引发“教案”,恐怕也有东西文化差异的因素。从万年农业的根上看,人类文明大致分为两大类:西方是一元论的,信奉一个绝对真理;东方是多元论的。

我们所讲的生态文明之多样性内涵,正来源于在早期人类告别蒙昧进入农业的生存方式初立之时,东亚多元化的气候地理环境派生了农业社会的多样性。这与西方文明在根源上就不同。

二、世界农业的异质性在西方殖民化扩张期间发生突变

欧洲告别蒙昧之初本来是在次生农业地区,相比西亚,形成的是次生文明——本来是在西亚两河流域周围形成的小麦为主的农业带,随着气候逐渐暖化,欧洲冰雪退去,那里的次生农业文明逐渐形成。

此后,罗马海盗文化长期掳掠财富形成的奴隶制的政治国家灭亡后,欧洲经历了漫长的千年黑暗。其间没有完整意义的国家,极易受到各种冲击。一场疾病或者北方维京人南下,都意味着灭顶之灾。欧洲历史上多次出现大规模的人口减少,因此把那段历史定为封建主义。我们 19 世纪被西方列强打得晕头转向之际错用了欧洲封建主义概念,把自己辉煌的几千年文明也说成是中世纪。其实欧洲因为中世纪以来形成的贸易逆差一直没有缓过来,所以在因互相战争而造成筋疲力尽之后去抢西亚北非,接着往美洲去掳掠,就把罗马奴隶制移植于殖民地大陆。

概言之,欧洲因长期的贸易和财政双逆差导致贫困,那就要走出去掳掠。这一跨越大洲的冒险所形成的是奴隶制三角贸易,贵金属白银流入中国。

直到十八、十九世纪,中国一直是第一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以及第一白银储备大国——占有全球白银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殖民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即欧洲人到了美洲和澳洲,把在欧洲形成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带了过去。欧洲气候好、多雨,基本上找不到灌溉农业的历史遗迹,大多是“漫坡种地”。这种方式到了美洲和澳洲,使得那里的早期殖民者占据的农场几乎找不到水渠灌溉模式。

所以,亚洲的灌溉农业生产和聚落而居的村社制度,在欧洲人复制的美洲和澳洲都不存在,在欧洲人复制的非洲也不存在。当西方人占领了北美洲、南美洲以及非洲这些大陆的时候,这些殖民地大陆主要采用了欧洲的生产模式,开始了简单的生产力扩张,即土地规模经营。

这套经验及其理论被我们照搬过来,成为高校教科书。可中国出去得了吗?我在世界上考察了几十个国家,开始去美国考察大农场,没找到原住民做农场主。后来到了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哪儿都找不到。为什么没找到哪个殖民化国家的农场主是原住民?为什么全是外来殖民者当农场主?殖民政府不给原住民财产证书,只让外来殖民者去抢地盘,然后把所谓合法的土地证书发给外来殖民者。殖民地的白人政权不会给印第安人发任何资产证明。因此美洲就演变成西方殖民者的大农场农业。这是靠大规模减少原住民人口而形成的规模化农业。

这种规模农业,我称之为“农业 1.0”。什么叫“农业 1.0”?请问:在殖民化之前农业可曾被作为产业?什么叫做第一产业?没有殖民化,哪有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历史?

欧洲农业的异质性,其实也产生于西方人的殖民化。

随着殖民化的扩张,欧洲向外大量迁移人口,从而形成欧洲自身土地资源的相对宽松,就从过去的所谓田园诗般小农村社,转变成小农场经济。欧洲就形成了典型的殖民地宗主国的小农场经济。因为没有办法与其派生的殖民地大农场竞争,所以宗主国小农场经济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绿色农业、市民农业、休闲养生旅游景观等农业。农业“三产化”率先在欧洲实行,就变成了一种国际经验。又因为它是以市民作为农场主的一种农业,也就是说农场不再由农民经营,60%以上的农场变成了由市民经营。因此,它的农产品消费者也会对外来农产品有强烈的排斥,这是社会文化的保护,而不是技术壁垒或是贸易壁垒。所以,现在中国的农业生产尽管过剩了,但凡向欧洲出口,均遭拒绝,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整个发展都是一种不人道的,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农业也没有基本的道义,就坚决不买我们的农产品。比如,鸡本来是飞的,非把它弄在笼子里,不讲鸡道;猪是聪明的动物,非弄在狭窄的空间里面催肥,不讲猪道。这是欧洲的一种社会文化。一般而言,莱茵模式比较讲社会性。因此欧洲的绿色农业、绿色政党,变成了欧洲的一种社会趋势。

这个由西方推进的殖民化过程,实际上已经把世界农业分化为三大类:一是殖民地农业,二是宗主国农业,三是原住民农业。三种农业的形成过程不一样,各自的政策和理念、运作经验也都是不可转换的。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政策制定者不了解农业模式发展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蕴,很多人去美国回来就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像美国那样实现农业现代化。真有本事你先把中国人口大规模减了?

东亚农业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小农村社制,这种制度完整保持下来的是日本和韩国。中央刚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时候,很多官员到韩国去学习新村运动。其实学来学去,学到的是我们传统的小农村社制度。因此还是要

回到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来,多一点文化自信——那一套本来是从我们这儿传过去的。中国的原生农业乃“江河淮汉”,东北亚那儿叫做次生农业地区,整个农业的演化过程晚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到后来,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等也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此,可以丰富我们对华夏文明数千年的积淀成就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论断的理解。

三、东西方国家形态的政治文明之形成及其演化

当人们思考东亚“四河文明”和西亚“两河文明”形成差异化的文化遗产时会发现,在以农业形成社会生存方式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只有中国的华夏文明一直延续着。相对而言,古代埃及曾经是长期依存于多元化农耕社会而延续下来的,但,埃及作为国家形态延续了几千年之后,还是中断了。

其实,应该讨论的是中华文明作为国家形态长期存续的原因到底在哪儿?

把与秦汉同时代的西罗马地图拿来比较,可以看到那是沿着地中海形成的环状帝国,因为罗马是一个以占有奴隶制劳动剩余为基础而形成的商贸帝国。它的所谓自由城邦周围地区都是奴隶地区。上层社会直接占有奴隶劳动贡献的最大化农业剩余,通过控制沿海的商贸城市来形成收益。所以,罗马的崛起在于打败了与之争夺地中海贸易航路控制权的埃及和迦太基。这两个背后被广袤沙漠包围、人民根本无处逃生的国家逐渐失去了优势。罗马人首先征服埃及,因为那是一个沿着尼罗河、靠绿洲农业生存的条状国家,没有形成广大地域纵深防御的条件。后来征服了半岛型的迦太基(现为突尼斯),这个国家也没有防御纵深。罗马人这才完全控制了地中海的商路,达至鼎盛期。

罗马人最难征服的是迦太基,历史上有名的“汉尼拔东征”,其名将汉尼拔率领迦太基军队曾经跨海打进了西班牙,再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半岛,就差不多要灭亡了罗马。但最后还是罗马打败了迦太基,屠城之后 70 万人仅剩 3 万!

罗马帝国完成了对跨亚欧非大陆的环地中海周围的完全控制,建立了因控制地中海商贸航路而形成的环形帝国。此后,罗马因为再也没有敌人,内部明争暗斗、骄奢淫逸而逐渐没有战斗力了;加上环形国家缺乏地域纵深,没有防御条件,加之其周边都是奴隶占据的地方,奴隶不可能替罗马人打仗,于是最终被蛮族从罗马核心区给灭亡了。从此,欧洲长期没有大一统国家,进入成千上万个小邦林立的“千年黑暗”的所谓封建制时期。

在东亚,国家基本制度不同于欧洲:一方面是农业立国;另一方面秦汉帝国是饼状的,有用于防御的地域纵深。

现在我国提出重新认识小农经济,因为小农村社制将长期存在。历史上的小农村社制度是和东部太平洋季风降水的不平衡从而迫使中国人建设水利系统高度相关的。中国地处多个复杂气候带,要想形成农业的长期生产,就一定要有水利。没有灌溉便不叫做田——也就是一块地上面有纵横的渠道,由干、支、斗、毛构成的渠系而产生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于是,村社的自治是以水利共享而形成聚落而居,这与间作套种的农业管理又是高度相关的。几千年来,我们不仅有因水利成村的聚落,我们还有以水立国的德治传承。中国人都知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因治水有功而成为部落首领,之后便把国家政权传给自己的儿子,由此禅让制转变成了父子相传的皇权体系。

农业社会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北方诸侯都得修长城?因为那时气候冷化,长城是当年的信息传输系统,所传递的主要是游牧部族骑兵南下的攻击信息——烽火台一路放烟火传递军情,这才来得及利用地域纵深的条件组织抵抗。有人说,为什么中国人那么蠢?劳民伤财修长城挡得住敌人吗?这恐怕是不太了解古代社会。为什么秦要为全国郡县修驰道?那是便于调兵协防郡县政权。据此看,世界上第一套对开双车道的高速公路,即驰道,就是在秦朝建立起来的。接着,为了对开就得“车同轨”,得罪了一大批“大马宽车”的旧贵族。为了从内地到边关都认识官方文件,就得“书同文”,也就引起了全国知识分子的愤怒,于是秦始皇杀了一批文人。为了货畅其流就要“统一度量衡”,那又得罪了商人……再加上大规模征集徭役修长城,势必得罪老百姓。社会各阶层都被得罪了,这是秦朝不仅“二世而亡”,而且还至今被痛骂几千年的重要原因。

但是,接着秦亡而发生的却是“汉承秦制”,汉朝继续完成这个大饼状的、有战略纵深的帝国。历史上只要有大一统,就能够抗击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遇到气候暖化时,农耕社会还能不断向北反扑。所以有当年汉武帝击匈奴,把匈奴压到欧洲去了。而到唐代,则先后灭了两大突厥。南匈奴和北匈奴是在汉代被消灭的,东西突厥是被唐代消灭的。突厥哪儿去了?突厥西进形成著名的“突厥走廊”,其中的一支向西南经略,攻入了君士坦丁堡,导致继承东罗马的“拜占庭”走向灭亡。东罗马及拜占庭不曾经也是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吗?却是被唐代打出去到了中亚、再转向西亚的突厥部族中的一支军队所击败,最后走向灭亡。

中国以国家形态存在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中断,取决于秦始皇当年构建的一个大饼状的、有地域纵深的、能够防御北方骑兵南下的广大空间。因此,对照环形国家罗马的灭亡,汉唐以来的中国统治阶级无不试图追回大一统,形成一个地域纵深广大的国家。如果没有形成大国,就会出现乱世,乱到什么程度?西汉最强盛的时候人口达九千万,到东汉末年三国两晋战乱之后,只剩下三百万。

纵看历史,没有一个广大的地域纵深的国家,就没有不中断的历史文化传承,农耕民族人口众多,但分散的小农村社无法保护自己。亚洲大陆气候地理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政治形态,国家也是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传承的载体。

我们认识到,由气候和地理所决定的生存文化内在的差异性,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现。据此可知,中华文明数千年传承说明一个新时代的转型概念:坚持生态文明,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演变的客观结果,不是主观选择,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拥有多样性的生存方式,包括社会方式、经济方式、文化方式。

进一步看,战国时期的长城主要是沿着四百毫米等降水线修的。为什么?因为四百毫米等降水线以南以东,是典型的农耕区域,往北往西,就是半农半牧区,再往北,则属干旱游牧带。所以,从气候带所决定的两条线,促使中国早期大一统国家的形成。

国家(state)是什么?首先要有一个足够调控社会资源的权力,其次就是对外作战的军队。战国时期,六国都要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压,而在周朝封建制之下,诸侯有私家军而没有国军。可是,北方六国修筑长城必须调度人力和资源,强大些的就自立霸主,演变为封建诸侯,因建立早期国家形态而自发地告别所谓封建制。

所谓封建制是什么?主要是分封,帝王把自己的族人亲友全部封出去做诸侯。中国自秦汉以来实现的主要

是郡县制,也早就不“封建”了。当然也有个别朝代实行分封,但是每次分封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秦朝郡县制以后差不多经过上千年的完善,到宋代最终改为三权分立、科考取士,形成以郡县为基本政权框架的、中央集中管理的国家体制。

据此,我们认为,中国并没有漫长的封建社会。只有夏商周约两千年是部落联盟过渡而成的封建制,而到了周代晚期、秦汉大一统国家组建之后,就已经告别封建进入统一,成为了权力统一于中央的郡县制国家。

四、乡土中国低成本的村社自治成为国家政治的稳定基础

就下层社会的乡村治理而言,与中央王权集中管理的上层制度有实质性差异。上层社会主要是通过郡县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协调,而郡县以下的乡村,长期是低成本自治的自给自足社会。

上层社会是官治,下层社会是自治,才能构建低成本稳定的国家二元体制。

因为乡村是一个自治社会,它可以长期封闭性地自主存在。很多从古到今的案例告诉大家,乡土社会实现自治是一个国家最节约成本的治理方式。如果一定要把官员体系安排到乡村基层,要搞一个与正规城市同样的治理,那就得支付很高的制度成本。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没有这样的成功典范。很多国家都已因治理成本过高而引发社会动乱。有的人动辄要求在农村建立现代法治,真对吗?关键是谁来支付制度成本?且不说目前县级财政三分之二严重亏损,很多地方占地套取70%现金用于填补把旧贷转为新贷的利息差额,否则拿什么支付庞大的制度成本?

中共“十九大”报告不再强调村民直选,而是强调由自治、法制、德治结合起来的的有效治理。

治理与管理的最大差别在于: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执行体系;治理是多种群体通过多元互动才能达到的稳态结构。信息的充分表达,才能构成良治。今天,大多数人研究乡村治理,其实是以管理概念为核心,最终落实到建议上无外乎是加强规范法制。具有强制性的法制难道是治理吗?当然不是。治理是因地理、气候等多样性而导致社会结构的多样性,通过这一自然多样性形成多元化群体基础上的经济文化活动,形成结构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20字方针就是针对此的。

中国下层社会长期存在良绅自治,其中“文”与“治”一般是一体的,维护文明的一定是良治。没搞社会广泛参与的良治能形成文明吗?“十九大”提出的“20字方针”,可以理解为“三生”(生产、生态、生活)+“文治”(文明、治理)。这和我们开展的生态文明试验及长期以来的乡村建设实践的内涵,都是高度吻合的。据此,怎么理解以生态文明内生多样性来构建我们的“三生+文治”,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我们搞“三农”研究的人应该关心的。

自古以来,当我们形成国家的时候,当秦汉从封建制演变成一个郡县制国家的时候,乡村作为稳态社会的基础结构,与之共同形成了农业社会的二元治理,上层社会叫官本位管理,下层社会叫乡村自治。

五、化危为机的投资拉动与三大差别再平衡

生态文明作为新世纪战略转型方向确立以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成为了主要矛盾。所谓不平衡、

不充分，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三大差别，即沿海与内地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和贫富之间的差别。

1985年，笔者曾经沿黄河走过四个多月来实地调研考察。因为在1985年中国政策界的一部分人强调梯度发展理论，那意味着“差别”扩大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为的。在此之前，中国内陆的发展其实是有特殊条件的，比如重庆、贵州、四川、陕西等都是当年国家三线建设投资的重点地区，大量的国家资本流向中西部。但在1985年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为地确定要按照梯度理论推进不平衡——先发展沿海一条边。

当时我的批判性还比较强，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只发展沿海一条边？那时候提出的不同意见是，中国应该是“π形”战略，除了沿海一条边以外，还有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我原本的想法是能够把长江黄河都跑下来。当时我就组织了一个摩托车队，从青藏高原，沿着黄河一路跑了八个省两万多华里。这样做其实是想向人们说明我国地大物博，不能只是单边式的不平衡发展！

当然我们的努力没奏效。中国沿着不平衡发展模式去追求短期的快速增长！如今看，既无可厚非，也没有对错。因为它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基本实现了区域再平衡和城乡再平衡。这也是对中国坚持“四个自信”的经验支撑。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搞政策调研的时候，特别强调农民在农村经济的自主发展权。诚然，那个时候中央政策也讲要赋予农民自主发展权利。所以那个年代出现过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主要因为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快于城市，短短十年农村工业化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我们的教科书写着资本原始积累充满了血腥。请问20世纪80年代农村工业化的时候有血腥吗？有人上访吗？没有，连告状信都很少。为什么这里的资本积累静悄悄，因为农民得到自主发展权，自己解决非农就业。短短十年中，农民自主工业化解决了一亿多农民就业，带来了农民收入增长，也带来了农民内需扩大拉动城市经济增长。那个时候，可以说不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而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政策调整，其实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发展权利。

今天大家都谈土地制度，也有很多人研究土地制度，请问有多少人研究过80年代土地制度为什么有利于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高速增长？因为这两种高增长，所以在1998年中央文件总结20年农村改革经验的时候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一是家庭承包；二是乡镇企业；三是城镇化。今天研究改革的人，还有几个人自觉把1998年的“三中全会”文件当做改革经验归纳呢？很少。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只有西方制度转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难道真有按照这“四化”成功进入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么？作为当年的政策人员，其实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这里只是说明，我们确实有过内需拉动型增长，有过城乡平衡的发展。

城乡之间的严重不平衡，是90年代政策导向下所发生的问题。所以我很无奈地强调，这不是农业问题，而是“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权利。这个建议与90年代的主流思想不一样，我就及时转型去读在职学位，做学术研究和国际项目，争取发表文章，为自己造点学术积累。

有过80年代提出到90年代实现的区域不平衡发展，也有过80年代之前的区域平衡发展，但这都不仅是客观的，也带有主观因素，所以才有后面的艰难调整。

因此，“十九大”说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是主要矛盾，其针对性很强。

政策的发展随着事物客观矛盾性质的不断演化而不断做出调整，这才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十九大”报告的最新思想关系到中国能不能引领 21 世纪的发展导向，进一步尽我们应尽的国际责任。

所以，战略调整、结构整顿，应该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因为当今中国的问题除了大家常说的债务过高，污染严重之外，还实际上面临着第二轮生产过剩问题。

第一轮的生产过剩已经过去了。对此提出政策建议者是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他早在 1997 年东亚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叫“双重过剩（生产和劳动力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所以，40 万国企倒闭，四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就是那一轮生产过剩所形成的代价。这个代价谁承担了呢？城市产业工人和农村农民。

那一次危机应对，主要是靠林毅夫以及马洪、陆百甫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中国主管经济政策的官员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从 1998 年开始的强力调控，中央直接用财政增发国债，以国债来拉动投资，以投资来稳定中国经济增长。

对第一轮生产过剩的应对措施不仅有效，而且还调整了区域发展不平衡。1999 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总投资 3.6 万亿，接着 2001 年起步的东北振兴总投资 2.4 万亿。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03 年继任随后推出中部崛起政策，政府投资都是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大调整。

不过，1998 年中国正在推进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这时候，中、农、工、建四大行出现三分之一以上坏账，银行没钱怎么办？中央直接增发国债支援基建投资。例如西部大开发投入的 3.6 万亿中，三分之二是国债投资。

西方很多人对中国体制不满意，国内很多人也跟着唱和；可是，如果没有这种相对集中的能力，我们无法度过那场危机。很多人都说，东亚金融风暴危机直接影响中国，中国怎么能够幸免于难？其实本来不应该幸免，因为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主要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外需拉动型增长，突然外需陡然下降，立刻跌入危机。所谓中国经验，不外乎就是政府逆周期调控“直接出手做多”。类似的应对危机的做法，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用过，而且采用后的效果非常显著。在那一场世界性的大危机中，欧洲所有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全垮了。罗斯福的宏观调控，直接用国债上内陆基本建设投资，私人资本停掉，私人银行停掉，就是政府直接出手干预。当罗斯福这样救了美国之后，他给自己定义为“新国家主义”。

第一轮生产过剩危机，我们化危为机就靠大规模政府投资，结果呢？中国形成了区域发展的再平衡趋势。比如重庆的崛起——如果没有国家大规模投资于山区的基本建设，重庆经济怎么可能起飞？现在重庆不仅是西部而且是全国 GDP 增长速度的领跑者，依靠的还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投资。

另一方面，自从 2003 年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来，国家于 2005 年启动了新农村建设，至今已经投进去十几万亿，针对的主要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除了像重庆那种大库区、大山区等地区不少贫困问题还没解决外，全国农村中百分之 98%至 99%的地方行政村实现了五通（路、电、水、气、宽带）。

中小企业现在纷纷兴起。如果说过去让农民放弃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他可能很高兴。那现在呢?劝他放弃农村户口则很难。很多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是大量城里户口的人纷纷回村去要求返回农民身份,获得农村户口。

中国在 90 年代末期遭遇第一轮生产过剩的时候,采用国债投资拉动增长,实现的是区域发展平衡战略。也就是说,对于生产过剩危机,中国直接的调控手段是政府出手做多,而不是放任市场做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罗斯福新政的中国版。

国家基本建设大规模投资带来的后果,是所有的实体性资产大幅增值。同理,国家大规模向农村大量通路、电、水、气、宽带,农村过去所有不计价的资源型资产随之水涨船高,全部计价升值。比如过去山上长了一棵好树,地里长了一田好油菜,只是个别背包客跋山涉水来看,有价格吗?没有。现在农村实现“五通”了,城里消费者开车来消费美景,于是景观农业就值钱了!但过去乡村是有巨大的潜在价值的资源,而不是价值化的资产。如果城里人来农村喝山泉水,乡下水值钱了;吸山里的清新空气,山区空气值钱了;上农家乐食宿消费,农民住宅值钱了。现在中国投资基本建设造成真正大规模增值的是实体性资产(physical property)。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始大规模投资以前,农民的地产只有十万亿左右,而现在 100 万亿都不止。资产大规模增值使得每一个拥有资产的人包括下层社会的农民,手里的资源性资产都具有增值空间。

实体资产增值带来另外一个机会,即中央政府据此大规模增发货币:一方面是随着国际贸易和国外投资的增加,带动对冲增发;另一方面,随着资产增值和增值过程中交易大量发生,实际上也在拉动货币化,而货币化产生的铸币税收益归了中央政府。因为中国是一个本币不对外开放的国家,除非外汇是生产投资,否则不得直接进入来炒作中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这点值得注意:恰恰是因为不开放本币、不开放资本市场,从而造成了中国自己的金融资本崛起。中国金融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世界大银行排名中,中、农、工、建全在前五位。

只要是中国人,有谁相信中、农、工、建各大行会破产呢?绝大多数不相信。为什么?是因为占据世界最大规模银行前五位的中、农、工、建四大行资本金的 80%以上是国家给的,四大行背后是国家信誉,因此能承担长期负债。国家金融资本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但有一条,它是稳定的。如果它破产,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

1998 年当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国中、农、工、建四大行全都是 1/3 以上坏账,按说大大超过巴塞尔协议规定的 8%。这在任何西方国家都必须破产,但在中国没破产,中央一条政策,把所有不良资产全部划出来组建四大资产公司去处置,使得银行债务归零,财政部下属的中央汇金重新注资满足巴塞尔协定的要求,然后把它推进股票市场去融资,这就是中国应对危机的办法。

总之,当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时候,怎样才能让这个最大发展中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中央政府逆周期的综合协调能力和基层政府夯实乡土基础应对软着陆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补短板,再平衡,从工业供给侧改革、农业供给侧改革,进一步过渡到全面贯彻生态文明、乡村振兴这些国家重大战略。这是中共“十九大”的重要精神体现。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5 卷 1 期,2018 年 1 月)

在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周年与乡村振兴战略研讨会暨

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年会上的讲话

胡兆荣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今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我国古代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讲法，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同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周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享受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带来的发展红利，探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见证我们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在一年来走过的足迹，在此我谨代表全所干部及职员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地感谢！

今天参会的单位有农业农村部、科技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部委领导和专家，部分领导因行程临时变动，不能亲自莅临研讨会现场，但领导们却专门发来了贺信，对大家参会的辛苦表示慰问和对研讨会的如期举办表示祝贺并预祝研讨会圆取得满成功。

本次研讨会得到了福建武夷山谌世茶叶有限公司、河北唐山霖亿枸树种植公司、浙江丽梦丝绸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代表研究所的全体同仁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201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国农村改革开放40周年。

这一年，我所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农业部、科技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林科学院等部委和科研院所的指导和帮助下，在社会各界同仁的鼎力支持下，通过本所全体职员的团结努力和无私奉献，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和阶段性的成果。

回顾这一年走过的历程，我们在充满喜悦与艰辛的道路上，收获着拼搏的豪情和胜利的果实。现将今年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1、按期完成了《通讯》的编排、出品和寄送工作

全年共计编排通讯16期（其中增刊和专刊共4期），发表文章160余篇，文章篇幅50万字。副部级以上作者20余人，司局长以上作者近百人。

2、完成了研究所官网和《农业科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的正常运行工作

在宣传形式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传播方式上赢得了高度赞扬，资讯内容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为“三农”最新资讯权威发布和农业创新科技的推广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3、扩大了基层三农调研员的征召工作

为了促进对基层三农工作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及时了解基层三农工作的动态，切实掌握基层三农工作的真实情况，准确获取基层三农发展过程中的信息，着实办好本所的《通讯》内刊和网站、公众号发布相关公众信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做好产、学、研、销一体化相结合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活动，我们报经院学术委员会批准，截止现在共在全国范围内征召了三百余名基层三农调研员，基本达到了全国省级城市和全国重点发达城市全覆盖，确保了基层三农信息的及时获取和农业创新科技的有力推广。

4、指导西部落后山区中药材种植加工助力脱贫攻坚

这一年，我所主要领导带领中国农业大学中药材研究中心、湖南农业大学中药资源与开发系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等科研院所专家，冒着冬九严寒、顶着满天飞雪、踩着坚硬山路，深入西部贫困山区，对重庆奉节、湖北利川等地进行了考察调研，并进行了现场指导和授课，使这些贫困山区的属地优势产业得到了健康的发展。

5、联合部分科研院所和实力型企业打造了国内最大的热带万果园

这一年，我所主要领导带领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技术推广站以及农业农村部的相关专家对河北大厂热代万果园项目进行了调研和论证。认为该项目目前区位优势好，产业布局合理，开辟了规模化南果北种、夏果冬种的先河。该项目由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万果园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位于大厂县陈府镇农业园区，占地一千余亩，总投资近二十亿元。

6、受邀中央电视台 CCTV7《相约》栏目与多名企业家互动对话

今年年初，我所主要领导受邀《相约》栏目，与多名企业家互动对话，现场解答涉农企业存在的技术难题和发展瓶颈，赢得了现场嘉宾的高度赞誉。

7、对重庆光电信息研究院进行考察调研，达成了植物工厂技术的升级和推广意向

这一年，我所主要领导带领蔬菜花卉研究专家一行对重庆光电信息研究院、重庆星河光电集团及重庆伯爵王照明设计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研，深入了解了研究院“小青”智能植物种植箱和智慧灯杆两个高新技术产品，并表示研究所将委派专家对该产品进行优化升级，满足市场需求和提高种栽培植的植物品质。

8、利用专家优势将光伏农业资源得到了高效利用和发挥

这一年，我所主要领导带领中国农业大学马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牛遗传育种研究室、中国农业大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系教授等科研院所专家一行在吉林梅河口市当地政府领导的陪同下对梅河口中城银信光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并对养殖品种、养殖技术、养殖结构的优化和布局等相关细节给予了高度的指导，使该项目的发展步入了良性的快车道。

9、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达成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这一年，我所主要领导亲自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进行实地调研，经过与该院党委书记、院一级学科带头人廖森泰同志的座谈，双方已达成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共识，确定了初步合作方案，确定了实施科研成果转化的下游企业。

10、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达成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

这一年，我所主要领导带队，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与戴晓峰所长及成果转化处的相关人员听取了该所中式食品加工与装备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张泓研究员关于马铃薯主食化、中式菜肴工程化、技术装备一体化技术成果的汇报，并进行了现场观摩；参观了农业部农产品加工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范蓓副主任关于农产品贮藏保鲜、包装、加工等过程危害物识别和检测技术的案例。参观结束后，经过深度座谈，双方根据各自的优势，均愿与对方达成战略合作。

11、与广东岭南师范学院达成了屋顶绿化技术的合作推广意向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视野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为了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同绘美好未来，广东省岭南师范学院的刘金祥教授经过多年刻苦努力，研发出易管理、低成本、全生态的屋顶绿化，已获得多项国家专利技术，对于国家“海绵城市”生态系统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目前，我所与该院也初步达成了合作与推广意向。

12、完成了旱稻的试种和独家推广权

这一年，我们与山东亿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旱稻研发团队合作，已经成功试种近万亩，每亩最低产量达到420公斤，最高产量达到了750公斤，今年下半年，在兰陵县还专门召开了现场会，相关媒体还进行了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部分领导和专家还专门到场进行了见证，该品种的成功研发，替代了低价值的玉米，对种植结构的调整，有效的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下一步，我们将选择中国的五大区域进行试种，从2020年起，我们将对该品种进行大面积推广，预计推广面积50-100万亩。

13、完成了陕西杨凌七彩田园农业科技园区的总体规划

这一年，我们会同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对陕西杨凌盛泰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的杨凌七彩田园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园区项目完成了总体规划，该项目的建成，将填补了多项西北地区高新农业的科研成果应用空白，规划中引进了目前国内少有的种养殖高新技术和品种，为杨凌的现代农业发展增加了新的亮点。

14、与相关单位成功举办了《第一届钱学森科学思想论坛》

12月中旬，我所同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沙产业专业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了《第一届钱学森科学思想论坛》，这对于产业经济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是对我国生物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和产业经济体制的改革起着积极的带动作用，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赢得了良好的赞誉。

同志们、朋友们，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总结过去，我们还有很多不足，虽然取得了不足挂齿的小成绩，获得了微不足道的小成就，但是我们在成绩面前永不满足，不断追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和探索，扩大更深层次的业务研发，扩展与国内顶级科研院所的合作模式，不断对自己和单位职员提出更高的目标。

四十年来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在风雨中砥砺前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农业经济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沃土，分析和研究改革开放的深远影响，必须从农业农村开始。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践行和贯彻此项英明的决策，我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今天，我们在一起畅所欲言，分享幸福的喜悦，纵览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巨大变化，这些成就是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也是我们每一位三农工作者，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焚膏继晷、发奋图强而取得的，我们今后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改革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站在农村改革四十周年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理由为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距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还任重道远，改革仍在路上，而回顾和总结，只是为了使尚无穷期的改革能够走得更加蹄疾步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即将步入新的一年，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我们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坚强领导下，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深刻把握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谱写新时代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发展新篇章！

（作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2018年12月22日）

关于重视推广《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科研成果的报告

中管院农经所河南研究室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以来关于建设新型农业现代化和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推动中国新型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全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快实现中国农业转型升级的发展目标，由揭益寿先生主编中管院参与主持编写的《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应广大读者要求进行修订再版，庆祝祖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建议农经所并报中管院协调农业农村部、国家出版总局及其他中央有关部门，以利于推广该书的科研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 1 号文件特别是 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精神，充分印证了《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一书阐述的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为了广泛应用该研究成果，推动新型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特请求中管院将该研究成果报告、推荐给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和领导同志，以便使该研究成果能够得到高度重视和广泛推广应用。

现将《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科研成果简述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系统研究中国新型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途径、发展措施的专著。该书第一主编揭益寿教授已是一位 92 岁高龄的耄耋老人，民盟河南省资深盟员。他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了绿色循环经济、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等新概念，并进行了系统全面阐述，形成了其完整的理论体系。

揭益寿教授研究现代农业近 40 年，出版过多部农业理论专著，共出版发行 8 万多册。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与技术促进处工作期间，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授予“亚太区 2003 年度杰出专家”称号。《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一书由民盟中央、民盟河南省委、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河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会主持编写，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农业厅、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水利局给予了指导，农业部法规司原司长、资深农业专家郭书田担任该书编审，农业部、科技部原副部长、教授、农业科技专家韩德乾、中科院院士、中国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环保所名誉所长蒋有绪、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河南省委主委储亚平分别作序，出版后曾分别呈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科学院、中国管理科学

研究院、科技部、农业部、河南省发改委、农业厅等部门有关领导审阅，受到了领导、专家的肯定和好评，认为这是一部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专著，是广大农业干部及农民的必备读物和培训教材，是一部好的参考书和工具书。该书被江苏省出版部门评为2015年“苏版好书”。

二、绿色循环发展理论创新的先进性

这部书自始至终贯穿了理论创新精神，通过对中国农业发展史的回顾，从农业发展方式变更的角度审视历史，找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变更的规律和原因；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和长远需要出发，探索经济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了重新表述；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对世界先进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深入对比研究，探索归纳世界多种先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先进性，认为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知识经济等先进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补的，从而提出了多种先进经济发展方式应当综合运用的著名论断。这种多种先进经济发展方式综合运用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揭益寿教授将其概括为“绿色循环经济”，因此“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就包括了世界多种先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所有科学先进的内涵。

经济发展理论必须与产业发展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彰显理论对于实践强大的指导作用和推动力。“绿色循环经济”的概念一经提出，很自然地就引申出了绿色循环产业、绿色循环农业、绿色循环工业、绿色循环服务业等一系列新概念。

在对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中，揭益寿教授紧紧与推动新型农业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央历次提出的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和措施以及众多专家、学者比较统一的观点和主张，归纳出了“现代农业十化”，即农业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产业化、专业化、集约化、信息化、商品化、绿色化、循环化、低碳化”，作为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主要内容和推动新型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措施与抓手，并对“现代农业十化”的概念与实施进行了全面阐述。

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对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的操作提出了“全程绿色生产、全程绿色循环”的基本要求，同时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现代农业生产要做到“八节一降一减一低二提高加循环”，即：节地、节种、节水、节肥、节药、节能、节劳、节粮，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减少污染物排放，发展低碳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农业经济效益，农业生产废弃物重复利用、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并对八节一降一减一低二提高加循环作为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的最佳途径和成功之路，从实践意义和技术操作层面提出了参考意见；并从便于实施的角度，适用于所有适度规模经营单位的高度统一管理方式角度，提出了“十五个统一”的目标要求和操作指南，即：统一繁种、选种、育种、播种、施肥、灌溉、灭虫草、收割、分拣、加工、包装、储藏、运输、销售、废弃物回收利用。这些理论、观点、方法和措施，都充满着创新精神，都是现代农业科学管理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先进性，对于推动绿色循环新型农业现代化具有指导意义。

三、绿色循环学术观点的科学性

《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提出的学术观点和科学论断，都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客观实际的要求。例如，该书把可持续发展观重新表述为“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与生活活动，不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不对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构成威胁，实现生态文明和代际均衡，最终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良性循环与协调发展”。这个表述就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理论界自19世纪50、60年代起对可持续发展提出多种不同的阐述进行归纳、比较和深入研究后提出来的。这个重新定义的可可持续发展观，视角更加广阔，纵观了当代和子孙后代，涵盖了人类的一些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内容更加完善，包括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代际均衡的目标要求，以及三大效益良性循环、协调发展；内涵更加丰富、深远，因为重新表述的定义涵盖面宽、内容全面，特别是全书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使它的内涵更加丰富，影响更加深远；表述更加准确、科学，主要是把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人的活动、资源、环境，用很简洁、很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如其中生态环境可以理解为自然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环境，生存环境除包括生态环境外，还可包括影响生态环境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所以，这个重新表述的可可持续发展观的定义，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深化和升华。再如，绿色循环经济是作者在研究生态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知识经济等世界多种先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先进性和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的多种先进经济发展方式综合运用的新概念。这既可以充分利用多种先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先进性，又可以避免其各自的局限性，这就是科学态度。因多种经济发展方式综合运用，理论体系庞杂，不易全面把握，专家们就理论的一个方面做重点研究是可以的，让实践者全面应用于实践就有难度，需要重新进行理论加工，使复杂的理论简明化，便于记忆、理解和操作。于是，揭益寿教授对多种先进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反复比较和深入研究后，认为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最具代表性，绿色经济代表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总目标，循环经济是其资源利用模式，生态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知识经济为技术支撑手段，生态经济和知识经济追求的目标都是绿色经济，都要靠循环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实现手段。这样，一个统揽世界多种先进经济发展方式所有先进性的绿色循环经济新概念就被提到了当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前沿，它的科学性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四、绿色循环理论体系的实用性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它来源于实践，还要回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使人们逐渐达到真理性的认识，才是真正有用的理论。揭益寿教授的理论研究过程，始终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为了使新理论、新概念真正成为有用的理论，多年来，揭益寿教授在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指导建设了30多个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基地，凡是按照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操作的地方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如吉林省永吉县岔路河、内蒙古赤峰市、河南省沈丘卢庄村县等。

揭益寿教授围绕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的实现途径开展了更为广泛、深入地研究，不仅提出了“现代农业十化”的发展途径，还明确提出了农业生产要按照“八节一降一减一低两提高加循环”的目标要求和在一个农业经济经营实体内要按照“十五个统一”的操作方式去操作。为了保证“现代农业十化”、“八节一降一减一低两提高加循环”和“十五个统一”等途径、目标要求和操作规范的实现，该书还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如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信息化建设、服务体系建设、农业项目管理等，并对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草业、林果业等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讲述了具体原则和操作规程。综观全书，《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从理论到实践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从管理科学角度看，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五、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的可操作性

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的可操作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世界先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简介比较完整，使读者更容易理解绿色循环经济理论概念提出的科学基础、合理性和新概念的先进性，提高读者对于绿色循环经济理论的认可程度。

2、对于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的主要内容“现代农业十化”的概念与实施，进行了比较系统地阐述，使读者对于新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式和途径有了具体、系统的领会，对于新型农业现代化应当怎么“化”不再感到虚无缥缈、漫无边际、无从下手，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方向和抓手。

3、“八节一降一减一低二提高加循环”不仅是发展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的战略措施、目标要求，本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从技术应用、管理措施等操作层面进行了详细叙述，使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基本理论不再停留在纯理论层面，而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

4、《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坚持科学态度、紧跟时代步伐，弘扬时代精神，以科学发展观总揽全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诸多学科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方式向绿色循环新型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然性、可行性、正确途径、科学方法、保障措施，这一切使《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兼具了理论指导性和实际操作性。

总之，《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一书的理论成果已被中央的一系列1号文件特别是2018年1号文件所印证，是符合中国农业发展实际的理论成果，实践将会继续证明，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是推进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中国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助推器，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实现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生态、营养、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中国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推动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目标的一部操作指南，是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一部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创新著作。

为了使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在中国农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特意呈报这份报告，渴望中管院给予我们必要的支持和鼓励。

附件：

揭益寿先生及其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理论研究过程简介

一、揭益寿简介

揭益寿，1927年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现河间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民盟盟员。参加工作以来，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从事计划、财务、物资管理、经济研究等工作，曾先后任副股长、副科长、副处长、治黄机械化项目负责人。退休后，曾先后担任郑州市企业管理专业学校校长、郑州持续发展培训中心主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兼科技部主任等职务。1992年至1999年11月在北京曾任绿色产业专家组组长；1999年12月至2004年8月先后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与技术促进处高级经济顾问，绿色产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绿色经济与绿色产业研究课题组组长，天津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山东大王职业学院客座教授等，现任民盟河南省委课题组首席专家、河南省农促会专家咨询指导委员会主任兼三农理论与实践研究室、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河南研究室高级顾问。是中国绿色产业的先行者、创始人、奠基人之一，并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授予亚太区2003年度杰出专家荣誉称号，2009年1月被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评为落实全省统一战线十件实事先进个人，水利部2009年度长期奉献水利优秀个人，2010年8月被民盟河南省委评为“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12月被授予“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虽然现年事已高，但仍致力于绿色循环经济、绿色循环产业和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二、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理论研究过程简介

揭益寿父亲是一位曾为新中国水利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老知识分子，其父逝世前曾给揭益寿留下这样的临终嘱托——为中国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而奋斗！

1984年他开始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同年四月，他担任第一主编，与韩永夫共同主编了干部培训试用教材《集体企业经营管理》；1986年创办了郑州企业管理专业学校并任校长。该校是一所专门培训乡镇企业和城市待业青年的一所学校。办学期间，他除了设乡镇企业经营管理专业课、待业青年就业课程外，还对学生进行了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教育。在此基础上，又和张锡山、韩永夫共同编著了《城镇集体企业经营管理》一书，并于1986年由劳动人事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多次被用为培训教材。根据实际需要，经六次修改补充后，又于1989年12月以《城乡集体企业经营管理》为名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1991年经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批准，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了郑州持续发展培训中心。持续发展培训中心成立后与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合作，编写了可持续发展培训教材，在1991年到1993年期间结合乡镇企业管理教育和待业青年就业培训，重点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教育内容，三年内共培训3万余人次。为了更好地推动落实国务院1990年11月颁布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规定》，更好地发挥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的作用，主编了《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经营管理》一书，并于1993年4月由中国劳动出版社出版。

1996年，与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乡合作成立绿色农产品展贸中心，任总经理，并成立了绿色产业专家组，任组长。专家组成立后，开展了“绿色经济的发展与绿色产业”专题调查研究工作，并取得了理论和科研成果，经过调查、研究、分析、加工、综合等研究方法，提出了发展绿色产业的“指导、先行、前提、基础、目的”五大发展原则。

1998年他通过实践，又提出了发展绿色产业的八大发展目标：一是超前发展目标；二是资金投入目标；三是人才开发目标；四是推动高科技运用目标；五是统筹协调发展目标；六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七是质量、市场导向目标；八是市场竞争目标。由于揭益寿先生对绿色经济与绿色产业理论研究的创新，后得到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与技术促进处的支持，并同意了他提出的关于建设绿色产业示范园区的建议。

1999-2004年，与陕西省大荔县、吉林省永吉县等地方政府合作共建了19个绿色产业示范园区，涉及14个省、市、自治区，总面积6万多平方千米，总人口约1100万人。2002年，《中国绿色经济绿色产业理论与实践》一书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揭益寿先生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主编的第一部涉及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的专著，该书曾被评为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第五届优秀教材学术著作一等奖。

2004年提出了应将多种先进经济模式综合运用到指导中国国民经济建设中去的新课题。此外还运用深入调查、研究的方法，不断实现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突破，最终在2005年4月出版了《中国绿色产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发行），提出了绿色循环经济的创新理念及发展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的创新模式。

2007年末成立了商贸港筹备领导小组，编制了《中原国际绿色有机农产品物流商贸港规划大纲》，对河南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此期间他又提出了建设绿色产业示范园区存在的八大误区及全面建设绿色产业示范园区运作的程序，提出了建设绿色产业示范园区，党和政府必须“树立一个发展绿色产业的决心，遵循环境 and 经济两个规律，找到一个不断改善生态环境的突破口，明确一个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这一整体思路，并对绿色经济、绿色产业、绿色产品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创新性的全面阐述。

2007-2009年期间，他通过深入农村进行调研，总结出了“三农”问题十大深层次矛盾和化解矛盾的途径，并开始着手探索、研究绿色GDP在发展绿色循环现代农业中的应用这一课题，以期进一步推动中国绿色循环经济的发展。为了指导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8月开始出版《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后经五次修订出版，共发行28000册。《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书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七大重点项目”，被评为江苏省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图书和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图书。

2009年河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会注册成立。2010年应揭益寿先生的要求，农促会成立了“三农理论与实践研究室”和专家咨询委员会，揭益寿先生被聘任为研究室主任和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首席专家。从此，揭益寿先生的理论研究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揭益寿先生对于过去多年来对于绿色循环经济、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及绿色循环现代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角度展开论述，主编了《中国农业发展模式创新与农业现代化》一书，此书由原农业部司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原所长郭书田先生担任编审，于2011年7月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为适应新的农业发展形势的需要，又于 2013 年 1 月修订再版。至此，揭益寿先生研究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2013 年揭益寿先生获得了首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理论的精神实质，增强该书的指导作用，使该书更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揭益寿先生领导研究室对于该书的内容再次进行了修改、充实和调整，定名为《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后《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获得了“2015·苏版好书”的荣誉。

揭益寿先生身为民盟盟员，但他一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常教导身边工作人员“做人要讲诚信”，“要想做事先学做人”。他做理论研究工作十分勤奋、刻苦，始终贯彻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不断地对中国发展绿色循环经济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力求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创新与突破，他先后在国家 and 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其中 9 篇获学术论文优秀奖，2 篇获河南省一等奖。并先后以各种面授形式培训政府工作人员和农民群众约 11 万人次，先后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体接受培训的人数更多。可以肯定，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发展理论对于指导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揭益寿先生的理论研究过程是漫长的、艰苦的，他的体会更是深刻的。他把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的科学管理归纳为 108 字诀，就是他深刻体会的真实写照：

绿色农业，方向正确，前途光明；
道路曲折，矛盾很多，困难极大；
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创新务实；
科学发展，依靠专家，依靠农民；
生态教育，科技培训，提高素质；
动态监测，改善环境，绿水青山；
产品认证，冲破壁垒，走向世界；
团结协作，持续发展，乡村振兴；
统筹协调，生态文明，全面小康。

目前，91 岁高龄的揭益寿先生因患重病已在医院病床上躺了 2 年，但是重病缠身并没有阻挡住他为振兴中国农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他躺在病床上仍在精心指导着《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的修订再版工作，他的目标是将《中国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研究》打造成为现代农业理论研究的精品，为 2019 年庆祝伟大祖国成立 70 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中管院农经所河南研究室

2018 年 11 月 12 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厅)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各研究所
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卢继传

副 主 编：辛 梅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电 话：010-59193366 59195293

010-66117652 57206299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邮 编：100125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